

# 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發展的 世代危機或轉機：十字路口或死巷？

莫大華\*

## 摘要

1980 年代末期建構主義理論迅速崛起成為國際關係學科既有核心理論正式認證的競爭者，歷經 30 年的發展也面臨停滯、危機與困境，將會走向十字路口或死巷？尤其國際關係理論整體研究正歷經國際關係研究的「實證科學性」與「理論終結」的爭論，建構主義的理論發展停滯正是國際關係理論此整體研究與發展的縮影，遂有不同世代的建構主義學者嘗試以不同的觀點尋求轉機突破困境，其中第三代學者提議「新建構主義」，引發不同世代學者之間的爭論與對話。藉此反思建構主義在後設理論、實質理論、經驗研究及理論本身等方面的可能方向，再造建構主義的未來發展。

**關鍵詞：**建構主義、新建構主義、實踐理論、關係主義、世代對話

---

\*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教授，E-mail: modahua@yahoo.com.tw

收件日：2020 年 4 月 18 日；修正日：2020 年 7 月 24 日；接受日：2020 年 10 月 24 日

# The Generational Crises and Opportunit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structivism's Development: Crossroad or Cul-de-Sac?

Ta-Hua Mo\*

##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of 1980s, constructivism has risen rapidly as the officially accredited contender to the established core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In the three decades, it has become a common approach in IR, as time go by, it faced stagnations, crisis, and paradoxes, toward to a crossroad or cul-de-sac? Particularly, the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experiencing the debates of “the science of positivism” and of “the end of theory,” the stagnations of constructivism is a miniature of the debates.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constructivists tried to find opportunities with various perspectives for breaking through the paradoxes, including in meta-theory, substantial theory, empirical research, and constructivism itself for recreating the future of constructivism.

**Keyword:** Constructivism, New Constructivism, Practice Theory, Relationalism, Generational Dialogue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u Hsing Kang Colleg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E-mail: modahua@yahoo.com.tw

Manuscript received: 2020.4.18; Revised: 2020.7.24; Accepted: 2020.10.24

建構主義已到了十字路口，隨著前方的路越走越慢，只會強化其改道的誘惑。

——尼古拉斯·奧弗 (Onuf, 2016a: 115)

建構主義的未來，被打包在它逝世的迷思之中了。

——史瓦帝·史瑞瓦斯塔娃 (Srivastava, 2017: *Symposium: Seizing Constructivist Ground? Practice and Relational Theories. v. 2.0*)

## 壹、前言

國際關係學者常以某理論的死亡說明其理論發展所面臨的困境，例如現實主義被預知死亡而未死的故事，以呈現現實主義堅強的適應力 (Guzzini, 1998)；雖然冷戰結束給了結構現實主義致命的一拳，但其並未死亡，反而是更加堅強茁壯 (Booth, 2011)；自由主義離奇死亡，但它仍然活了下來 (Reus-Smit, 2001)。國際關係理論之所以沒有死亡，正是因為學者呼籲拯救而重生。例如呼籲要從建構主義論者 (constructivists) 中拯救建構主義，因為建構主義論者在探討「認同」(identity) 時，和理性主義論者一樣將行為主體性 (agency) 視為是事先既定的，國家中心主義及理念決定論 (ideational determinism)，是鑲嵌了理性主義的建構主義論者如彼得·凱斯辛坦恩 (Peter Katzenstein)、亞歷山大·溫特 (Alexander Wendt)、伊曼紐·阿德勒 (Emanuel Adler)，並非建構主義式的建構主義論者，理性建構主義者必須確保主體性 (subjectivity) 或行為主體性是藉由過程與實踐而來 (Tan, 2006)；或是呼籲以搶救結構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理論為觀點，探索現實主義學者面臨理論主張與事實發展不符的質疑，以及一落千丈的學術地位所進行的理論調整及重新解釋 (鄭端耀，2011)。這樣的「置之死地而後生」論述方式，提醒學者關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與發展的現狀，尋求其未來的研究方向。尤其國際關係理論整體研究正歷經國際關係研究的「實證科學性」與「理論終結」的爭論，建構主義的理論發展停滯正是國際關係理論整體研究與發展的縮影。

建構主義理論迅速崛起成為國際關係學科既有核心理論正式認證的競爭者，是個非常成功的故事 (Guzzini, 2000: 147)。奧利佛·凱斯勒 (Oliver Kessler) 甚至說：「建構主義是國際關係中一隻奇怪的動物」(Kessler, 2016: 43)。尤其是建構主義內部的現代建構主義、詮釋建構主義與激進建構主義之間的知識論

爭論，以及建立知識論中間道路 (middle ground or via media) 或建橋計畫的爭論，皆是顯示建構主義內部的爭論不小於其與理性主義之間的爭論 (莫大華，2006)。甚至是以知識史的世代觀點探討建構主義內部不同主張之爭論與對話，就誠如布萊特·史迪爾 (Brent J. Steele) 所言：「每個興起的建構主義世代都曾經挑戰了先前建構主義論者的異例、不足或轉型」(Steele, 2017: 72)。因此，就如同其他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一樣，歷經30年的發展也正面臨危機與困境了，不同世代的建構主義學者遂嘗試尋求不同轉機突破困境，再造建構主義的未來發展。但這並未意味著建構主義已經變成邊陲理論，而是顯示出建構主義深厚的理論反思性，其學者藉由反思建構主義理論本身而尋求轉機。

本文意圖探索不同世代建構主義學者尋求突破理論發展危機與轉機的過程，以及建構主義理論的未來發展方向。第貳部分論述國際關係理論的「實證科學性」與「理論終結」爭論，以瞭解建構主義的理論發展停滯是國際關係理論整體研究與發展的縮影。第參部分以近年重要期刊專輯及專書出版作為論述前提，瞭解不同世代建構主義學者正積極反思其理論發展的停滯及尋求突破。第肆部分延續第貳部分的前提，深入論述不同世代建構主義學者藉由爭論與對話，提出不同的觀點及議題拯救與延續建構主義的學術理論地位。第五部分論述不同世代建構主義提出的發展方向，包括後設理論、實質理論及經驗研究上，甚至在建構主義理論本身及新建構主義爭論上，作為本文結論。

## 貳、黎明前的黑暗： 國際關係理論的「實證科學性」與「理論終結」爭論

建構主義理論發展從成為三大主流理論之一，正到了十字路口及面臨危機，這涉及到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整體狀況，尤其是反思主義或後實證主義學者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發展不時產生後設理論爭論，其中影響甚鉅的爭論在於是否要依據實證主義科學觀建立學科的科學性，甚至是否依此科學觀發展普遍理論，<sup>1</sup>正反兩方學者都提出各自的觀點，並無一致的結論，但多元的研究觀點和方法則是獲得支持，也促使出現「理論終結」的爭論，進而影響建構主義理論發展走向了十字路口，以及不同世代的建構主義學者反思理論發展的危機與轉機。

<sup>1</sup> 依據實證主義的科學要求，科學理論應該是描述與解釋經驗現象或事實的因果關係，進而預測與控制此因果關係，並且可以再製及重複此因果關係，以及能普遍地適用於一切的經驗現象及事實，即是普遍理論 (general theory)。

## 一、國際關係的「實證科學性」爭論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知識發展歷史中，尤其是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史的各次大辯論爭論各理論之間的差異，主要仍是在爭論其「科學」與否 (Kurki & Wight, 2016)。國際關係理論學者從科學觀 (idea of science) 開始爭論國際關係研究的科學標準，尤其在第三次大辯論期間，國際關係學者引用後實證主義科學哲學的觀點反思國際關係理論的知識發展，特別是實證主義知識論觀點決定了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科學標準，於是雙方爭論國際關係研究的「科學」標準或是否有此標準。

寇林·威特 (Colin Wight) 就說：「當實證主義正統主宰了科學哲學，國際關係學科的選擇是非常簡單但明顯的，不是科學就是不科學，這可以有效地翻譯成不是實證主義就是消失 (positivism or perish)」(Wight, 2002: 40)。然而，努諾·蒙泰瑞歐 (Nuno P. Monteiro) 和基文·盧比 (Keven G. Ruby) 批判了國際關係的科學哲學基礎辯論並未如其所承諾使國際關係更為科學，提升國際關係知識；他們認為這是由於學者多是以哲學立場相互爭論，基於信念 (faith) 的基礎而接受哲學立場某些的核心假定，意圖建立「獨尊一統的基礎」(imperial foundation)，但是國際關係或是科學哲學都沒有普遍接受的研究標準方式，哲學論證不能也不應作為國際關係研究問題的正當化 (legitimate) 工具，所謂的哲學立場爭論實際是政治爭論，國際關係是不需要哲學基礎的 (Monteiro & Ruby, 2009a)。簡言之，即是學術霸權地位的爭論，爭奪國際關係研究的正當性，藉以主宰國際關係學科的「科學性」。

國際關係理論學者各自引述不同的科學哲學觀點相互爭論「科學客觀性」，難有定論。上述蒙泰瑞歐和盧比的觀點 (Monteiro & Ruby, 2009a)，就促使2009年*International Theory*期刊以「總之，誰需要科學哲學啊？」為名的專題，邀請學者進行正反意見的爭論，雙方並無定論，仍陷入各說各話的困境 (Bohman, 2009; Chernoff, 2009; Jackson, 2009; Kurki, 2009; Mercado, 2009; Monteiro & Ruby, 2009b)。之後，國際關係學者仍然爭論「國際研究必須是一門科學嗎？」派翠克·傑克森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的答案：不是，跨事物疆界的研究不必然有特定的致知方式，其他方式亦有其相同價值，應該欣賞其差異性 (Jackson, 2015)。但國際關係理論學者艾佛·紐曼 (Iver B. Neumann) 認為答案：是，實踐的智慧 (phronesis) 是沒有區分美學及規範的範疇，科學學科是有其特定的可普遍化之知識型態 (Neumann, 2015)。直至今日，此爭論仍是

方興未艾，仍將威脅國際關係理論發展是否仍要陷入這種沒有定論、沒有答案的虛幻爭論？國際關係學者也嘗試以「社會科學」的觀點探索國際關係的學科屬性。由於美國在兩次大戰後的政治重要性及其國際關係學者著作的影響，以及大學、學者與政府之間的連結，以美國為基地的國際關係學者主導了國際關係研究，國際關係研究常被認為是美國式的社會科學 (Crawford & Jarvis, 2000; Hoffmann, 1977; Kristensen, 2015)、美國霸權的學科 (Smith, 2000, 2002)，或是已經失敗的知識計畫 (intellectual project) 或落後的 (backward) 社會科學 (Buzan & Little, 2001)，始終沒有定論而持續爭論之中。

如同國際關係研究對「實證主義科學」的爭論一樣，此「社會科學」的爭論也是沒有定論，仍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期刊繼續爭論之中。但紐曼認為國際關係研究發展成一門學科，是與社會科學其他學科（尤其是歷史學科與哲學學科）有密切關聯，追求理論引導經驗研究的知識 (Neumann, 2014)；當前國際關係研究方式的挑戰不在於撰寫的體裁、理論或後設理論而是在資料蒐集與分析的方法，尤其缺乏有關質化研究方法的爭論。因此，國際關係學者日漸重視探討方法論與研究方法，尤其是關於社會科學的國際關係研究量化與質化研究方的爭論，遂出現多重 (multiple)、混合 (mixed) 或多元的 (plural) 研究方法，不再強制單一的研究方法 (Lacatus, Schade, & Yao, 2015)。例如 *Millennium* 在 2015 年第 43 卷第 3 期以整期的篇幅討論國際關係研究的研究方法，仍是不同主張之間的對話與爭論，但主張引進新方法例如視覺、電影、紀錄片、敘述、計算、大數據和演算法及混合多種研究方法則是共識 (Barkin, 2015; Bleiker, 2015)。

這種質疑國際關係「科學觀」、「科學標準」及單一研究方法的主張是與美國政治科學自 2000 年開始的「改革重建運動」(Perestroika Movement)<sup>2</sup> 有關，即使它是一場喧鬧的政治科學研究革命，反對實證主義、量化研究及理性

<sup>2</sup> 2000 年 10 月 15 日，有封匿名為「改革重建先生」(Mr. Perestroika) 的電郵寄給美國政治學會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所出版《美國政治科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編輯委員會的 17 位政治學者，在其「改革重建宣言」(Perestroika Manifesto) 中，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美國政治科學評論》所有的文章都是相同研究方法，不是統計就是賽局理論？宣言呼籲解除該刊歐威爾式的體制 (Orwellian system)，即是由「東岸上流人士」(East Coast Brahmins) 小圈子主導了此學會及此刊物，呼籲改正該刊操弄數學符號的理性抉擇、形式模型及實證量化研究的學術霸權，希望政治學者根據「問題導向的研究」(problem-driven research)、「方法論的多元主義」(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以及「科際研究」等三項原則建立「周全的科學」(ecumenical science)。隨著學者將其訊息轉寄給其他學者，引起美國政治學界的「改革重建運動」(Perestroika Movement) (Perestroika, 2005: 9-11)。

抉擇 (rational choice) 主流趨勢，但仍衝擊了政治科學及國際關係研究且深且廣 (Monroe, 2005)。此運動主張質化與量化混合的多元研究方法，甚至也不主張發展普遍理論 (徐振國, 2013; Keohane, 2015)，反對強加知識論與方法論的共識於政治科學，而成為常態科學 (normal science) (Kasza, 2001)。<sup>3</sup>連帶著也出現了國際關係理論的「終結」爭論，爭論國際關係理論是否已經終結或死亡，學者是否不再探索與建立普遍理論。

## 二、國際關係理論的「終結」爭論

國際關係理論歷經「理論大辯論」、「理論典範戰爭」(Paradigm Wars) 之後，遂有學者主張各理論對話與綜合的多元主義 (Jackson, 2011)、分析折衷主義 (analytic eclecticism) (Sil & Katzenstein, 2010) 或是中層理論 (mid-level theory) (Lake, 2013)，以顯示出國際關係理論的多樣性及綜合性 (Ferguson, 2015)。但國際關係理論多元主義之後，出現方法論的無政府主義限制了此學科進步的可能性與科學性 (Chernoff, 2013)。現在出現「理論和平」(theoretical peace) 的時期，不再爭論理論之間的「典範戰爭」，遂重視理論檢驗 (testing) 而忽視理論發展，引起學者思考與爭論「國際關係理論終結」議題，乃至「國際關係研究終結」(The End of IR)。

國際關係學者為何爭論國際關係理論是否終結或死亡呢？不外乎是憂慮與擔心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狀況，例如理論的定義模糊、缺乏大辯論、重視檢設假定、理論擴散與裂解，以及多元主義的問題。例如關注國際關係理論正走向簡單的假設檢定 (simplistic hypothesis testing) 研究而忽略建立理論的研究，研究方法勝過了理論，這是「走向滅亡之路」(Mearsheimer & Walt, 2013)。或是認為國際關係理論的沒落或主張放棄所有的理論，只是因為誤解了理論的真正本質而忽視許多的理論化類型，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過程如同是反思性不斷增加的歷史階段，學者不斷反思國際關係理論的理論化方式 (modes of theorizing) (如規範的理論化、後設理論的理論化、本體論的理論化及經驗的理論化)，理論化不是在製作食譜而是在撰寫未完成的辭典，有許多不斷增加的字語 (terms) 需要繼續更新其本身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 (Guzzini, 2013)。更有學者檢視國際關係

---

<sup>3</sup> 常態科學是科學哲學家湯瑪士·孔恩 (Thomas Kuhn) 的觀點，他認為常態科學是建立在過去的研究成就，即是典範 (paradigm)，並為科學社群所認同，也主導了未來的知識擴展及解謎 (puzzle-solving)，但當常態科學無法解決研究問題或異例時，科學社群越多成員質疑其研究方法與典範，遂發生危機而出現科學革命，而由新典範取代舊典範 (Kuhn, 1962: 10-42)。

理論發展史，直指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不論是進步或停滯，歸結都是「大理論的匱乏」(the poverty of grand theory) (Brown, 2013)。<sup>4</sup>

學者檢視當前國際關係理論狀況的爭論，包括各典範的爭戰 (paradigms war) 已退潮、不再有大辯論及中層理論化 (middle-range theorizing) 盛行，致使學者悲觀地認為國際關係理論終結。他們則是主張國際關係理論終結是美國社會科學的國際關係臨終喘息，美國主導的國際關係學科已不在也不再復返 (Jackson & Nexon, 2013)。也有學者樂觀地認為爭論國際關係理論終結，有助於重新檢視國際關係既有的假定、信念與承諾，以及過去、現在及未來方向，也同時要思考國際關係理論開始的時間與如何開始的，理論之間並非是消滅對方而是帶動國際關係的啟蒙 (Williams, 2013)。

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學者而言，國際關係理論並未終結也不可能終結，因為國際關係的「終結」爭論只是要提醒學者關注整個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狀況及未來方向，只要國際關係學者持續不斷自我反思整個學科及本身理論的發展，國際關係理論就能吸納不同理論觀點或立場而展現出國際關係學科反思的能力。在此觀點及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整體氛圍下，建構主義學者也就自我思考建構主義理論發展的危機與轉機，不免也就有悲觀與樂觀的觀點，悲觀的學者看到的是發展停滯的危機，樂觀的學者看到的是突破的轉機。

### 參、曙光乍現：建構主義理論發展停滯與突破的反思

1980 ~ 90年代崛起成為國際關係主流理論之一的建構主義理論，到了2010年代，建構主義學者多聚焦於理論假設檢證 (hypothesis testing) 而忽略創新及強化理論內容，理論發展也就停滯了。建構主義學者阿德勒就認為，這是國際關係進行理論與研究的常態且視為當然的方式；因為建構主義「已經歸化了 (naturalized)……學者以建構主義觀點或理論綜合觀點研究世界政治，無須再揮動建構主義大旗 (flag waving) 了」(Adler, 2013: 112)。發展遂陷入瓶頸，出現了「建構主義枯萎了嗎？」(Wither constructivism?) 和「建構主義何去何

<sup>4</sup> 美國社會學者查理士·米爾斯 (Charles Wright Mills) 以「大理論」(或譯巨型理論) 嘲諷塔寇·派森斯 (Talcott Parsons) 的《社會體系》(*The Social System*) 結構功能理論，尋求建構一個有系統的人與社會本質之理論 (a systematic theory of the nature of man and society) (Mills, 1959: 23)，但社會的型態是異質的，社會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 (Mills, 1959: 26-30)。另外，大理論沉溺於文句及昧於語義 (Grand theory is drunk on syntax, blind to semantics)，實務者難以真正地理解其意 (Mills, 1959: 34)。其後，政治思想家昆廷·史金納 (Quentin Skinner) 檢視 20 世紀人文 (社會) 科學多位著名學者的思想觀點，認為是「大理論」已歸返人文 (社會) 科學研究 (Skinner, 1985)。

從？」(Whither constructivism?) 的問題 (Srivastava, 2017: *Symposium: Seizing Constructivist Ground? Practice and Relational Theories*. v. 2.0)。尤其是使建構主義成為主流理論之一的關鍵學者溫特提出量子力學理論作為補充其建構主義的知識論核心論點，運用量子意識理論（假設）(quantum consciousness theory or hypothesis) 證明科學實在論的觀點，即是能科學地研究與證明理念與意識在形成集體認同及行動的作用，更是引起國際關係學者爭論 (Guzzini & Leander, 2006)。遑論溫特後來引量子心智 (quantum mind) 理論嘗試統一社會科學的社會本體論與自然科學的物理本體論，克服心物二元論或身心二元論的爭論 (Wendt, 2015)，即使他說仍是較聚焦於國際關係研究 (Wendt, 2015: 2)，但已脫離了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研究，更是國際關係學者難以理解的方式。

建構主義創立學者之一的奧弗更是憂心，以「十字路口」隱喻建構主義面臨何去何從的困境，他指出建構主義理論發展緩慢下來了，並且已經到了十字路口，隨著前方的路越走越慢，就只會增加改道的誘惑了 (Onuf, 2016a)。因此，呼籲建構主義學者必須且也要有所作為。新世代建構主義學者大衛·麥克寇特 (David McCourt) 則以「當前危機」稱述此時的發展困境，呼籲強化其應有的理論與實踐的反思性，朝向發展「反思建構主義」(reflexive constructivism) 或「新建構主義」(New Constructivism) 的方向發展 (McCourt, 2016a; 2016b)。此方向引起建構主義學者的世代爭論與對話正逐漸出現，攸關著建構主義的未來發展（詳見後文第肆之三所述）。

2016 ~ 2017年是個轉機之年，不同世代建構主義者在期刊專題探討了建構主義的未來發展，探討的議題相當廣泛，涉及後設理論、實質理論、研究方法、經驗研究與建構主義本身。三本歐美政治學及國際關係研究期刊：《政治科學：政治科學與政治》(*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國際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及《歐洲國際研究評論》(*Europe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分別以「美國學界國際關係建構主義論者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US Academy)、「獲取建構主義論者立基之地？實踐與關係理論」(*Seizing Constructivist Ground? Practice and Relational Theories*) 及「建構中的國際關係研究：第三代」(*Constructing IR: The Third Generation*) 為專題，聚集不同理論學派學者及不同世代的建構主義理論學者討論建構主義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發展挑戰、危機與方向。三個專題的編輯史迪爾、丹尼爾·內克森 (Daniel Nexon) 和凱斯勒都是屬於第三世代的建構主義學者，他們積極藉由建構主義不同世代學者之間，以及與非建構主義學者之間的對話，探索建構主義理論的未來發展方向。

2017年由哈瑞·高德 (Harry D. Gould) 主編的《製造世界的藝術：尼古拉斯·奧弗及其批判》(*The Art of World-Making: Nicholas Onuf and His Critics*)，代表著不同理論學派學者，也包括第二代及第三代建構主義學者，與第一代建構主義學者奧弗之間的對話，因為每章都由奧弗就學者的批評作回應 (Gould, 2017)。例如第一章由第三代的麥克寇特及史迪爾探討第二代建構主義學者錯誤詮釋第一代的原始著作，並以有問題的方式檢證其知識，引起「後第二代」(第三代)以同情的方式詮釋第一代的著作，例如奧弗的《我們製造的世界：社會理論與國際關係中的規則與統治》(*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第二代以「社會化」(socialization) 錯誤詮釋我們製造的世界中的規則，應該是以「社會鬥爭」(social struggle) 詮釋規則在此世界中的統治作用，但第二代也擔負起承先啟後的，開啟國際政治的道德與倫理面向成為研究的重要議題 (McCourt & Steele, 2017)。奧弗回應指出，兩人將社會鬥爭作為他這代的時代精神，雖然正確但還要加上其個人的世代經驗，社會鬥爭會被顛覆或背叛而少有成功 (Onuf, 2017a: 15-16)。

2018 ~ 2020年，有四本第三代建構主義學者主導的專書出版，第一本由馬瑞安諾·貝圖西 (Mariano E. Bertucci)、傑諾德·海斯 (Jarrod Hayes) 和派翠克·詹姆斯 (Patrick James) 2018年合編的《被重新思考的建構主義：過去、現在與未來》(*Constructivism Reconsidered: Past, Present, and Future*)，集結了不同世代的建構主義學者及不同理論的學者重新檢視建構主義的前世、今生與來生，從第一代的奧弗自嘲是博物館保存良好展示的恐龍，提出知覺科學 (the science of perception)、認知 (cognition) 及認知語言學 (Onuf, 2018)；第二代的奧岱·寇羅鉅 (Audie Klotz) 批判建構主義學者內部的性別隔閡、種族隔閡及偏見 (Klotz, 2018)；到第三代的麥克寇特以建構主義學者的觀點評估建構主義的未來，由於來自頂尖大學學位計畫的學者太少，建構主義在美國的國際關係研究空間將會隨著時間而減少，在國際上，建構主義也就失去其意義 (McCourt, 2018)。

第二本由傑·巴金 (J. Samuel Barkin) 和洛拉·史喬柏格 (Laura Sjoberg) 合著的《國際關係最後的綜合？脫鉤建構主義論者與批判研究途徑》(*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st Synthesis? Decoupling Constructivist and Critical Approaches*) 質疑建構主義與批判理論之間的理論綜合關係，認為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理論綜合造成國際關係理論化停滯，批判理論與建構主義理論綜合造成建構主義理論化發展停滯 (Barkin & Sjoberg, 2019)。

第三本由馬克·雷蒙 (Mark Raymond) 的《規則制定在世界政治的社會實

踐》(*Social Practice of Rule-Making in World Politics*) 檢視建構主義學者所提出的建構機制及程序（例如建立規範、社會學習、策略性的社會建構、社會化、說服及競爭等等），並探討其間的相互關係，藉由國際規範制定的個案研究（例如拿破崙戰爭後維也納會議規範強國關係、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禁戰規範、美國反恐戰爭及規範網路領域的國家行為等相關規範制定）呈現政治行動者參與程序規範的制定、詮釋及運用過程，展現政治行動者再製、轉變及改變規範的社會實踐 (Raymond, 2019)。

第四本由史迪爾、高德和凱斯勒合編《謀略的建構主義、方法與國際關係》(*Tactical Constructivism, Method,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探討支持或反對建構主義所運用的詮釋研究方法，以瞭解建構主義的界線、複雜性及限制，包括建構主義內部的世代界線及差異、詮釋研究方法不同的運用方式及目的，以展示建構主義的豐富性，本書作者們不能，希望未來世代的學者也不能，沒有人能馴服及約制建構主義 (Steele, Gould, & Kessler, 2020)。

這些期刊專輯與專書反映了建構主義不同世代學者的反思，意圖藉由爭論與對話，論辯及思辨現在的危機與未來的轉機，提出不同的觀點及議題拯救與延續建構主義的學術理論地位（詳見後文第肆與第伍部分）。也更反映出第三代建構主義學者積極尋求突破現存發展停滯的困境，謀求新建構主義的發展方向，使得建構主義理論發展的危機或轉機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關注議題。

## 肆、旭日東昇：建構主義理論發展的危機或轉機？

建構主義是一種研究社會關係的方式 (way) 或架構 (framework) (Onuf, 1998: 58, 2002: 137)，<sup>5</sup>在歷經其奇怪的經歷 (strange career) 多年之後 (Onuf, 2002)，在1990年代逐漸成為國際關係主流理論之一。但到了2010年代，卻是「有許多優秀的建構主義個案研究，但沒有主要的理論聲明，遠不及其創立學者所提出的理論立場，此正是他們原始經典著作的價值所在。」(Brown, 2013: 490) 建構主義並未維持其不斷自我批判反思的承諾，反而在 1990年代中期陷入「中間地面（中間道路）」的位置，致使學者相信不再需要質疑其歷史時刻及哲學見識的歷史性與偶然性，遂充斥著太多的中間道路建構主義，選擇性地約束其反思的動力及批判工具，而掩護了特定的規範性及意識形態的組合構造

<sup>5</sup> 奧弗原是用研究社會關係的方式稱之，後認為用架構較為合適，因為這樣就可以使觀察者在此架構內提出更多的理論或普遍解釋，以及共同適應各種理論 (Onuf, 2013: 38-39)。

(configurations)，而使其快樂時期不再 (Barder & Levine, 2012)。建構主義理論的未來發展也就走向了十字路口，不同世代的學者必須反思其過去的錯誤、現在的危機與未來的轉機，尋求延續其創新觀點與價值。這也顯示出建構主義深厚的理論反思性，促使其未來仍會是國際關係主流理論。

## 一、建構主義的十字路口：奧弗的反思

建構主義創立學者之一的奧弗以十字路口隱喻當前建構主義的理論發展與研究緩慢，憂心建構主義的未來方向 (Onuf, 2016a)。他也指出建構主義學者在1990年代成為重要人物時，犯下三項錯誤，一是全盤接受功能社會學觀點，以及認為法律理論與政治理論完全沒有差異，遂未質疑規範是否是規範性的；二是以認同取代了行為者主體性，解釋冷戰的結束，直接從個人認同跳躍成集體認同，沒有反思地將行為者主體性轉嫁成想像的集體性；三是將文化視為綜合殘差 (aggregated residual) 變數，<sup>6</sup>並賦以極大的因果顯著性，認為文化是社會建構的最重要結果 (Schouten, 2015: *Theory Talk*)。傑佛瑞·查克爾 (Jeffrey T. Checkel) 則是認為建構主義已到中年，需要轉向因果機制，展現建構關係的因果過程 (Checkel, 2017)。即是建構主義的發展面臨了（中年）危機，需要思考未來的方向尋求轉機。

何以至此呢？第一，因為隨著建構主義的發展而缺乏共同的知識論，建構主義學者產生了「知識論焦慮」(epistemological anxiety)，遂引用各種不同的知識論及方法論主張而使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分歧與方法論多元（莫大華，2009），尤其美國國際關係學界強調實證主義知識論而造成建構主義內部的碎形差異 (fractal distinction) 及有問題的二分法分類，窄化建構主義的理論空間，包括結構論偏見、強調理念勝過實踐及偏好因果關係勝過組成關係 (McCourt, 2016b)。

第二，建構主義能成為主流理論之一，以及當前其理論與研究發展緩慢，可說是「成也，溫特；敗也，溫特。」所致。溫特的著作使國際關係學者關注與研究建構主義，尤其是其主張的中間道路建構主義 (Wendt, 1992, 1999)，即使遭受學者的質疑與批評 (Guzzini & Leander, 2006)，建構主義仍成為國際關係主流理論之一，甚至對於建構主義的辯論也聚焦於溫特，他仍被認為當紅的建構主義學者或大師 (Hollis & Smith, 1991)。就在 2006年溫特運用「量子意識理論」

<sup>6</sup> 殘差是統計學中依變數觀察值與預估值之間的差距，綜合殘差是指所有依變數殘差之和。簡言之，文化是所有依變數的總結，以文化作為所有問題的因果解釋變數。

(quantum consciousness theory) 作為其回應各方批評的知識論主張，嘗試證明科學實在論 (scientific realism)<sup>7</sup> 的觀點，即是能科學地研究與證明理念與意識在形成集體認同及行動的作用，溫特要以量子意識理論的「知識論非基礎論」(non-foundationalism) 說明實證主義的解釋與詮釋（後實證）主義的理解所提供的知識都是部分的而非完整的，兩者必須互補。因此，他提出「知識論的威斯特伐利亞」(epistemological Westphalia) 兩者相互承認對方在瞭解社會生活的共同目標上之貢獻 (Wendt, 2006: 216)。溫特嘗試以「量子力學」取代笛卡兒「上帝」發展其心物二元論的回應方式，但這已經超越國際關係學者的思考認知範圍了，也就難以再運用溫特的新建構主義理論於經驗研究了，也無法在此新理論上開展新的理論發展（莫大華，2010）。遑論溫特後來以量子心智發展其統一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本體論 (Wendt, 2015)，就更非國際關係學者所能理解。誠如他的學生提姆·魯克基 (Tim Luecke) 所言：「許多國際關係學者對此是有點失望，因為他們要他在國際關係成就大事」(Stangebye, 2016)。

最後，建構主義理論發展少了溫特之後，再加上建構主義創立者之一弗里德里希·克拉奇維爾 (Friedrich Kratochwil) 發展其實用建構主義之後（莫大華，2011），與奧弗陸續退休，兩人退休引起國際關係學界重新注意建構主義的發展，並有論述兩人理論的專書出版，帶動一股反思建構主義過去的思潮（莫大華，2015）。但沒有三位重量級學者的建構主義也就發展緩慢了，進而引起新世代建構主義學者的批評與反思。或許誠如奧弗所言，這是建構主義已經發展成常態科學，發展緩慢是常態；在美國政治（國際關係）學界的影響力正在衰落當中 (Onuf, 2016a: 115, 2017b)。克拉奇維爾也反省建構主義以滑稽方式求生存及其消失，遂以著名的百老匯音樂喜劇《春光滿古城》(*A Funny Thing Happened on the Way to the Forum*) 隱喻建構主義學者像是古羅馬城的一位奴隸，為了爭取自由，不得不使盡各種手段幫助主人追求高級妓女，弄得整個羅馬城人們（隱喻國際關係學者）都要瘋了 (Kratochwil, 2016)。

顯示出建構主義創立者對於理論發展現況的憂心，當奧弗以十字路口隱喻當前建構主義的發展緩慢時，他認為應該向左走，先走向米契爾·傅柯 (Michel Foucault) 後現代功能論 (postmodernist functionalism) 對事物進行微物理探索 (micro-physical investigations)，藉由不斷聚集 (aggregating) 研究成果的整合過程

<sup>7</sup> 科學實在論認為真實世界是完全獨立於人類所理解之外，人類無法以經驗觀察到的實體或世界是客觀存在的，人類能藉由科學理論及知識探究與理解真實世界，因為科學研究的假定、知識或理論所描述及解釋的世界、實體、狀態及過程是真實存在的。

而使功能運作能定位化 (localized)，即是規則已正式化為分配機制，制度成長於功能複雜性，以及功能運用 (exploitation) 更有效率；再走向全球社會學，以功能分化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探索現代性的全球化，尤其全球化正在裂解國際法，法律專業人員、技術專家與行政幕僚的自主性凌駕了國家權力及顛覆國家授權的國際法而成為全球制度。完全具體落實的 (realized) 建構主義只有加入微物理或全球社會學，並協調兩者之間的空間，才能有許多用途及有所目的地 (Onuf, 2016a: 130-131)。

建構主義的向左走或向右走，都反映出建構主義第一代學者自我反思的能力。但新世代建構主義學者麥克寇特批評建構主義當前的停滯，這是因為建構主義對於國際關係知識的建構方式，以及學者在此過程中的角色缺乏足夠的反思性，未能發展反思的反思性 (reflexive reflexivity)，即是在分析世界政治時，同時自動分析該知識的社會建構 (McCourt, 2016a)。即使以建構主義學者不同世代延續的觀點論述國際關係歷史及學科變遷或反思性，仍不免呈現當前第三世代建構主義學者面臨的危機或挑戰 (Leira & de Carvalho, 2016; McCourt, 2016a; Michel, 2016)。奧弗就曾批評麥克寇特的觀點，認為麥克寇特無須用「反思性」批判前世代建構主義學者，因為他們早已有反思性，「反思的反思性」就像是「無的放矢」(the road from La Fleche, point nowhere) 沒有幫助 (Onuf, 2016b)。簡言之，兩者爭論在於建構主義理論的反思性之深淺，而非有無反思性，此理論反思性正是建構主義學者思考理論轉機的基礎。

雖說如此，建構主義的未來發展方向又要如何尋求轉機？尤其是在不同世代之間不同的觀點之下，建構主義理論又要何去何從？但第三代學者麥克寇特則認為此反思能力是不夠的，遂引起另一場爭論與對話，學者們更深入探討了建構主義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建構主義內部出現新世代或第三代學者自我反思建構主義的未來發展，承繼建構主義理論後續的挑戰與轉機，形塑新世代的建構主義理論延續其學科核心理論的地位。

## 二、建構主義學者的世代爭論與對話

建構主義並非是一模一樣的 (Katzenstein, Keohane, & Krasner, 1998: 680)，也沒有共同的語言 (Klotz, 2001)，卻又無所不包，也就無所為是了，難有其特定屬性 (Sjoberg & Barkin, 2018)。尤其內部的知識論差異及爭論已經使得其學者呼籲建立溝通對話的橋樑 (Christiansen, Jørgensen, & Wiener, 2001)，但這仍無法有所成效，反而是減緩、停滯或走向十字路口。

### (一) 知識歷史的世代差異觀點

遂有學者聚焦於建構主義在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史或主要著作的出版年代，以知識歷史的世代觀點尋求重新思考、評估及反思建構主義，意味著建構主義的傳承與轉型。第一代是1980年代是建構主義肇始的時代，其學者有約翰·魯格 (John Gerard Ruggie)、克拉奇維爾、奧弗、雷蒙·杜瓦爾 (Raymond Duvall)<sup>8</sup> 和約瑟夫·拉培德 (Yosef Lapid) 等及其他人；第二代是1990年代建構主義興起成為主流、有長期影響、多樣及成熟的理論之時代，學者米契爾·巴納特 (Michael Barnett)、寇羅鈞、理查·裴斯 (Richard Price)、瑪莎·費尼摩爾 (Martha Finnemore)、馬拉達·布寇凡斯基 (Mlada Bukovansky)、傑佛瑞·查克爾 (Jeffrey Checkel)、瑪格瑞特·肯內克 (Margaret Keck)、凱薩琳·鄭克英克 (Kathryn Sikkink)、君士坦恩·瑞厄斯-史密特 (Christian Reus-Smit)、鳩塔·威爾迪斯 (Jutta Weldes)、凱斯辛坦恩和泰德·侯培夫 (Ted Hopf) 等人；介於兩代之間的學者是溫特和阿德勒；後第二代 (post-second generation) 或第三代是批判或反對第二代建構主義的時代，學者如亞歷山大·巴爾德 (Alexander Barder) 和丹尼爾·雷凡 (Daniel Levine)；不同世代皆有所認知的問題及與其他國際關係研究途徑的不同關聯 (Kessler & Steele, 2016; McCourt & Steele, 2017)。依據此觀點，後續第三代建構主義學者還有高德、史迪爾、內克森、麥克寇特<sup>9</sup>和凱斯勒等人關注建構主義的後續發展。

建構主義學者在建構主義知識歷史變遷的原因及過程，以及各世代的歷史觀點皆有所不同，依據重大歷史事件區分三個世代的建構主義學者，以標誌冷戰結束的美蘇1986年「雷克雅未克高峰裁核會議」(Reykjavik Summit) 稱述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的第一代學者為「雷克雅未克世代」(Reykjavik generation)，批判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缺乏歷史性 (ahistoricity)，而主張聚焦於宏觀歷史發展的變遷、歷史偶然性 (contingency) 及多重觀點 (multi-vocal) 性質，但本身卻少於研究歷史，多引用次要的歷史資料來源及缺乏歷史性；另以標誌人道干預道德規範的「波士尼亞戰爭」(1992 ~ 1995) 稱述戰後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中期的第二代學者為「波士尼亞世代」(Bosnia generation)，積極從歷史找尋特定資料來源（主要仍依賴次要的歷史來源）證明規範與理念的重要

<sup>8</sup> 杜瓦爾是溫特的老師，奧弗是克拉奇維爾的老師和好友。

<sup>9</sup> 史迪爾和麥克寇特是克拉奇維爾的學生，巴爾德和高德是奧弗的學生。

性，以「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 呈現歷史變遷走向更自由的世界；以及以標誌人道干預道德規範改變的「伊拉克戰爭」(2003 ~ 2011) 稱述戰後2000年代中期到2010年代的第三代學者為「巴格達世代」(Baghdad generation)，主張歷史變遷結果的開放性，強調首要的歷史資料來源，以歷史學 (historiography) 觀點展現歷史進展難題及困境的複雜結果 (Leira & de Carvalho, 2016)。這展現出不同世代建構主義學者面對國際關係重大事件時，其探索事件的「歷史性」上的差異觀點，從第一代忽視歷史而到第二、三代強調歷史。

### (二) 符號互動理論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運用差異的觀點

建構主義理論的基礎社會理論之一是符號互動理論，各世代運用此理論也有差異的觀點，第一代建構主義學者隱含地或半吊子地 (half-heartedly) 引入符號互動理論，未能引入其最有價值的洞見，遂無法呈現規範擴散及社會化的具體實踐；第二代學者在建構國家認同及外交政策模式開展了符號互動理論的洞見，但是建立在前述早已簡化的符號互動理論，遂未全面開展建構主義分析的潛能；當前第三代學者重新轉向符號互動理論深入探討自我與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分析、本體論與知識論），以及國際政治的權力（邊緣化、排除及宰制）、規範（順服或抵抗）及偏差行為（正常或不正常）等問題，以呈現國際政治的秩序是社會互動而成，即是行為者（無論其權力強弱）相互之間的互動所構成 (Adler-Nissen, 2016)。簡言之，建構主義學者理解與運用符號互動理論的開展，是隨著世代進展而更為深入及熟練。

### (三) 使用方法論差異的觀點

不同世代的建構主義學者使用的方法論也有不同，第一代較使用詮釋主義，第二代較使用實證主義，第三代則是回歸詮釋主義或後實證主義，強調論述研究及意義詮釋的重要性，也將會與大眾以更為參與、對話及動態過程共同形成較為有活力的學術社群，更為接近社會真實 (Ish-Shalom, 2020)。由於建構主義理論家族內各世代對於建構主義及知識產生過程有著不同的兩種致知的心智過程或認知模式（聯合式 [joined] 及分離平等式），<sup>10</sup>第三代建構主義運用維

<sup>10</sup> 聯合式是指理解其本身在社會世界中的處境，及作為社會世界的一部分，並運用推理論證 (reasoning) 其觀點；分離平等式 (separate but equal) 是指先藉由差異分離而獲得思考空間，再藉由與當代主流理論相同的推理論證而確保此思考空間 (Peltonen, 2016: 81-82)。

根斯坦哲學、完形心理學<sup>11</sup>及現代物理學溝通此兩種模式，有助於建構主義的演進 (Peltonen, 2016)；或是以研究的修辭 (rhetoric of inquiry) 或法律推理 (law reasoning) 實踐建構主義實質的後設理論內容 (Michel, 2016)。簡言之，建構主義學者運用的研究方法隨著世代進展，更為廣泛多元，但詮釋主義仍是其核心的研究方向及方法。

#### (四) 學者地理分布差異的觀點

建構主義學者地理分布也有其世代的差異，尤其是美國與歐洲之間的差異，前者是作為理性主義（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對立觀點，具有引自歐洲學者部分的非實證主義 (nonpositivists) 及批判研究 (critical approach) 的詮釋哲學觀點，未來仍將維持其作為對立觀點的少數派地位或消失；後者並非作為理性主義的對立觀點，反而具有美國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實證主義觀點，並較完整引述歐洲學者哲學觀點，學者較不會自稱為建構主義學者而是自稱為國際（關係）政治社會學者、國際（關係）政治理論學者或批判性安全研究學者，尤其《國際政治社會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期刊於2007年出版後，該刊論文作者大多不自稱建構主義學者；第一代建構主義學者以美國為中心，將其學生安排於美國政治科學最高專業梯隊的能力有限，但安排在美國以外地區，則能力就較強，所以第一代與第二代學者在美國以外著名大學任教及出版機會較大；美國大學政治學系是否繼續培養有志於建構主義研究的學生，以及美國建構主義研究對美國以外地區學者的影響，都關乎第三代學者的未來 (McCourt, 2018)。簡言之，建構主義學者世代演變顯現出美國建構主義學者不再主宰建構主義理論發展，而是歐洲及其他地區在建構主義學者是未來理論發展的關鍵。

從上述的世代分析觀之，建構主義學者以世代論觀點凸顯不同世代的差異，藉以尋求建構主義未來的轉機或生與死，其中以第三代建構主義學者麥克寇特提出的「新建構主義」引起不同世代建構主義學者的爭論與對話。在此其中，顯示出第一代建構主義學者對於理論發展的憂心及關切，第三代建構主義學者尋求轉機的困境及挑戰，以及不同世代學者之間的對話與爭論。

<sup>11</sup> 完形心理學認為人類的認知是經過知覺系統組合後的形式 (form) 及態樣 (shape)，是動態組合的整體 (wholeness)，是連結各部分而成整體的過程，遂整體大於個部分的總和，各部分受到整體的制約。

綜合上述所言，歸納出建構主義不同世代學者之間的主要特點及其差異如表一。

### 三、建構主義未來的生與死：麥克寇特引起的爭論與對話

第三代建構主義學者麥克寇特強調建構主義的真正價值在於使國際關係學者關注國際政治發生所在的社會系絡與文化系絡，他並運用與建構主義真正價值相同的「實踐理論」(practice theory) 與「關係主義」(relationalism) 組成「新建構主義」，實踐理論認為行為者受到實務的需要 (imperatives)、習慣及鑲嵌的傾向所驅使；關係主義認為實體是由正在進行的過程所構成，遂過程與關係是分析的原始事務 (McCourt, 2016b: 475)。與其說是運用價值相同的「實踐理論」與「關係主義」，不如說是他運用了國際關係「實踐轉向」(practice turn)<sup>12</sup> 與

表一 建構主義世代主要特點差異之比較表

世代	開始時間	主要特點	學者
第一代	1980年代末	1. 批判國際關係主流理論 2. 引社會理論與哲學發展建構主義理論 3. 符號互動論理解世界政治的社會建構 4. 詮釋主義觀點為主 5. 美國大學學者為主	魯格、克拉奇維爾、奧弗、杜瓦爾、拉培德
兩代間	1980年代末～ 1990年代末	發展中間道路建構主義理論	溫特、阿德勒
第二代	1990年代末	1. 經驗檢證建構主義理論 2. 綜合建構主義理論與理性主義理論 3. 誤解建構主義理論的社會性、批判性與實踐 4. 符號互動論未盡其功 5. 實證主義觀點為主 6. 美國及歐洲大學學者為主	巴納特、寇羅鉞、裴斯、費尼摩爾、布寇凡斯基、查克爾、肯內克、鄔克英克、瑞厄斯-史密特、威爾迪斯、凱斯辛坦恩、侯培夫
第三代	2010年代	1. 重新詮釋建構主義理論 2. 第二代建構主義 3. 重返及強化符號互動論 4. 回歸詮釋主義 5. 美國以外的大學學者是關鍵	巴爾德、雷凡、史迪爾、內克森、麥克寇特、凱斯勒、高德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sup>12</sup> 國際關係學者引入各式各樣的「實踐理論」運用於國際關係研究，成為「國際實踐理論」(international practice theory) 倡導「實踐轉向」(莫大華, 2011; Adler & Pouliot, 2011a, 2011b; Bueger & Gadinger, 2014, 2018)，研究國際實踐或實務以發展實用知識 (practical knowledge) 為目的，國際實踐理論並非提供普遍理論、大理論或將一切事物的本體完全社會化，而是要呈現世界政治實際運作的許多面向 (Adler & Pouliot, 2011c: 3)。

「關係轉向」(relational turn)<sup>13</sup> 的風潮。此新建構主義要解決建構主義日趨窄化的問題、其內部（知識論及方法論）的碎形差異及有問題的二分法分類，以實踐關係主義 (practice-relationalism) 的場域理論 (field theory)、網絡分析 (network analysis) 及行為者網絡理論 (actor-network theory) 擴展建構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空間，以保持國際關係學者對社會脈絡與文化脈絡的敏感度，避免建構主義的結構論偏見、重視理念輕忽實踐及偏好因果關係甚過於組成關係，促進建構主義論者與非建構主義論者之間的對話與辯論，呈現建構主義的再興及再創新 (McCourt, 2016b)。他的觀點促成2017年《國際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的線上研討會，以及建構主義學者在其他期刊論文發表不同的批判意見，呈現出學者對於建構主義的過去與未來、死亡或讓位，以及樂觀或悲觀的不同觀點。這也展現出建構主義當前發展的困境與挑戰，即是不同世代建構主義學者之間的差異觀點，仍會使建構主義徘徊在十字路口上，各走各的路。

#### (一) 反對的建構主義學者論點

第二代建構主義學者侯培夫批評麥克寇特的論點並沒有證據證明建構主義盛況不再，而且因果關係與組成關係的問題是仍有待解決，以其本人為例，建構主義並未偏好因果關係勝過組成關係；場域理論、網絡分析及行為者網絡理論不是解答，而是新增的思考工具，「實踐理論」與「關係主義」並無法解決（相互）主體互動的問題 (Hopf, 2017: *Symposium: Seizing Constructivist Ground? Practice and Relational Theories*. v. 2.0)。凱斯勒指出麥克寇特尋求替代管道及概念復活建構主義，但他身為建構主義學者不願轉向「實踐理論」，因為「實踐理論」與「關係主義」也不能解決建構主義停滯的二分法問題，「實踐理論」誤解（人文社會科學的）語言轉向，無法掌握相互主體性的問題；兩者要一起建立新建構主義仍有遙遠的距離 (Kessler, 2017: *Symposium: Seizing Constructivist*

<sup>13</sup> 關係社會學認為社會世界是動態開展的關係與過程，行為者藉由傳動 (trans-action) 及互動過程建立關係，社會現象是關係情境 (relational context)、行動者 (human agency) 和經驗的社會行為 (empirical social action) 三種要素組成，關係情境由文化脈絡 (cultural context)、社會結構脈絡 (social-structural context) 和社會心理脈絡 (social-psychological context) 所組成的網絡領域 (network-domains)，這三者獨自運作及維持著縱橫交錯、互相重疊的狀態，並影響行動者經驗的社會行為，指導著行動者之間的交往互動模式 (Emirbayer, 1997; Emirbayer & Goodwin, 1996)。國際關係建構主義學者引入「關係社會學」理論批判國際關係理論的實質主義 (substantialism) 與本質主義 (essentialism)，即是假定（社會）世界是由實質或本質所組成的存在事物 (things)，例如假定「理性」是社會世界的本質之一，社會世界的行為者具有理性，行為者是自我授權的理性者 (self-authorizing rational actor)，但關係建構主義學者認為行為者之間的互動建構與重構社會世界 (Weber, 2020: 1-2)。

*Ground? Practice and Relational Theories. v. 2.0*)。第三代建構主義學者也是實踐理論與關係主義者史黛西·高達德 (Stacie Goddard) 認為建構主義窄化及碎形差異不是特例，社會學理論也是如此，並批評麥克寇特以週期循環 (cyclical) 的觀點看待建構主義的興衰或內部差異，而應該是以對話的 (dialogical) 觀點看待；實踐理論與關係主義者樂於自稱建構主義論者 (constructivist)，但麥克寇特卻呼籲他們擁抱建構主義的標籤，這會忽略兩者在語意上的政治性；對他們而言，使用建構主義一詞會挑起及重啟理論典範之間的爭論，無論是語意政治或理念政治，事實上都是權力政治 (Goddard, 2017: *Symposium: Seizing Constructivist Ground? Practice and Relational Theories. v. 2.0*)。

君士坦恩·布格爾 (Christian Bueger) 更指出，不是每位建構主義學者都是「實踐理論」學者，也不應該是；「實踐理論」需要精緻及合適的方法論，而且科學的進展是各理論觀點之間爭論的結果，不同的意見會帶來知識創新 (Bueger, 2017: *Symposium: Seizing Constructivist Ground? Practice and Relational Theories. v. 2.0*)。辛西里亞·林奇 (Cecelia Lynch) 也質疑麥克寇特的觀點，只是陷入標籤陷阱 (labelling trap)，「實踐理論」需要將意圖及倫理納入研究議程，產生有關 (實踐) 「意義」 (meaning) 的具體卓見及概念 (Lynch, 2017: *Symposium: Seizing Constructivist Ground? Practice and Relational Theories. v. 2.0*)。史瑞瓦斯塔娃認為麥克寇特的論點像是設定建構主義死亡身後的未來方向，建構主義已死的謠言被誇大了，支撐此誇大謠言的是國際關係學界內的政治及學者歸屬團體內外 (in-group/out-group) 的權力動態過程；在每次探索建構主義的狀態時，就會如此 (Srivastava, 2017: *Symposium: Seizing Constructivist Ground? Practice and Relational Theories. v. 2.0*)。

綜合上述反對學者的觀點，他們並不認為實踐理論與關係主義可以解決相互主體性的問題，實踐理論並無任何創新之處，新建構主義也沒有什麼新穎。新建構主義妄求統一建構主義內部分歧，阻礙了知識創新，每位建構主義學者不是也不該是實踐理論學者。簡言之，實踐理論與關係主義不是建構主義未來的道路及方向，新建構主義無助於建構主義突破停滯與困境。

## (二) 支持的建構主義學者

即使多數學者反對，但仍有少數幾位學者支持，例如亞歷山大·蒙哥馬利 (Alexander Montgomery) 認為麥克寇特的新建構主義觀點統一了場域理論、網絡分析及行為者網絡理論網絡分析，給了學者克服構造論 (constructionism) 興衰循環的新希望 (Montgomery, 2017: *Symposium: Seizing Constructivist Ground?*

*Practice and Relational Theories. v. 2.0*)。提·所羅門 (Ty Solomon) 則是支持麥克寇特的觀點，因為他認為建構主義學者必須繼續發展新理論及研究途徑，保持建構主義在國際關係領域開放及充滿生機的空間 (Solomon, 2017: *Symposium: Seizing Constructivist Ground? Practice and Relational Theories. v. 2.0*)。

針對上述支持與反對學者的意見，麥克寇特以建構主義的過去與未來提出回應，對此這些學者的觀點有較批判與悲觀（例如高達德、蒙哥馬利及史瑞瓦斯塔娃），也有較樂觀（侯培夫、凱斯勒和布格爾），他認為新建構主義是值得支持，也能對國際關係歷史及哲學基礎的反思過程有所貢獻。他認為從排名頂尖的國際關係相關學系2000年聘任建構主義學者數字減緩，以及實踐理論也不是由在美國工作的學者所推動，建構主義理論盛況不再。他承認實踐轉向與關係轉向是不同，但不應誤導認為知識辯論無關學科內外的權力關係；遑論自由主義的世界觀主宰了國際關係學科，建構主義在美國的國際關係學界是具有重要位置，實踐轉向與關係轉向是值得支持；關係主義學者高達德、內克森及傑克森等人，從他們的生涯來看，稱他們建構主義學者，是因為他們結合了建構主義與關係社會學者觀點，而不是只來自第一代建構主義學者。他承認場域理論、網絡分析及行為者網絡理論的確無法解決問題，但提供了有用的新觀點 (McCourt, 2017: *Symposium: Seizing Constructivist Ground? Practice and Relational Theories. v. 2.0*)。

即使麥克寇特提出了樂觀回應，但誠如提默·華特 (Timo Walter) 認為新建構主義正陷入方法論的死巷，需要接受反思性作為詮釋實踐意義標示索引性 (indexicality of practice/meaning)<sup>14</sup> 的必要元素，以明示構成國際關係的實踐邏輯；即是以參與者與觀察者在特定系絡 (context) 可觀察的實踐活動做為實質理論化的起點，作為新建構主義的經驗研究基礎 (Walter, 2019)。

麥克寇特引起的爭論實際是源自建構主義不同世代學者之間的知識論爭論，學者以「世代分析」(generational analysis) 區別國際關係的研究主題、傳承、論點及特質等，藉以比較不同世代學者之間的異同，建構主義學者也不例外地出現世代轉型與衝突 (Steele, 2012; Steele & Acuff, 2012: 8-11)。尤其是麥克

<sup>14</sup> 華特主要是引用民俗社會人類學者哈洛德·葛芬科 (Harold Garfinkel) 及皮耶·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等人的「索引性」與「反思性」觀點，檢視國際關係新建構主義或實踐轉向的文獻，認為實踐索引性被深深地誤解而阻礙了其作用，所以在建構其國際性的實踐邏輯上，需要接受反思性作為詮釋的必要條件 (Walter, 2019)。所謂索引性是指特定的語言必須索引到特定的對象，反思性是指行為者以自身為對象思考分析。

寇特設定了建構主義已死的前提，也就引起建構主義內部學者之間的爭論。第一代的奧弗就曾自喻為保護狀況良好且會說話的恐龍，以說明建構主義並未滅絕而是存活了下來，並得以知覺科學 (the science of perception) 及其與認知的關係回應建構主義內外的問題 (Onuf, 2018)。事實上，第一代的克拉奇維爾和阿德勒早就運用實用主義 (pragmatism) 強調實踐理論，發展出實用建構主義理論嘗試突破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停滯困境 (莫大華, 2011)。麥克寇特的關係 (建構) 主義觀點也是已有建構主義學者提出「程序關係主義」及「關係建構主義」相同的論點 (Jackson, 2006; Jackson & Nexon, 1999)。麥克寇特的觀點也就不是甚麼新觀點，遑論又設定建構主義理論已死，不免也就遭致反對多於支持了，但這正顯示出建構主義學者的理論反思能力與活力。

綜合上述所言，麥克寇特的新建構主義觀點及其支持、反對與回應的論點，歸納整理如表二所示。

不同於上述麥克寇特結合實踐理論與關係主義的新建構主義觀點，中國大陸國際關係學者秦亞青 (2009) 採納建構主義理論的基本假設和分析構架，吸收社會學關於社會關係性 (relationality) 的論述，亦即過程中的關係和關係中的行為體，就以「關係性」與「過程」發展出關係本位的「過程建構主義」，將過程定義為運動中的關係，論證過程的自在性、過程動力和過程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其過程建構主義後改名國際政治關係理論 (relational theory)，此關係理論基於三項基本假定而發展：假定世界是一個人們相互關聯的關係世界；假定實踐性知識和表像性知識互為表裡、內在統一；假定後設 (元) 關係是一體兩面、相輔相成、互為生命，和諧而非衝突才是社會的本原狀態 (秦亞青, 2015, 2016)。簡言之，其關係理論假定自我存在與他人存在及共同存在是相一致，自我利益與他人利益也是相一致 (Qin & Nordin, 2019: 606-607)。

雖然秦亞青並未以西方社會學的關係社會學及過程社會學 (process sociology)<sup>15</sup> 為其理論的主要依據，或是以上述不同世代學者的觀點論述其建構主義或關係理論，他主要是參考傑克森和內克森 (Jackson & Nexon, 1999) 運用

<sup>15</sup> 過程社會學認為社會世界是一套正在進行的社會互動過程，並且不斷變化，即是由相互依賴的人們其行動交織 (interweaving) 產生的過程及結構，人們各自追求利益及目標而形成不同的社會形式或構造 (social forms or figurations) 或是人際關係網 (web of human relationship)，隨著社會的集中化及國家形成過程而強制個人及產生社會分殊化，增長了社會互賴的鎖鏈，必須關注其他人的行動並逐步學習成為自我調節的文明人，即在長期互動作用下，由本人自我強制內化 (automatic self-restraint) 成習慣，即是成為文明人的「過程」 (Van Krieken, 2001: 353-363)。

表二 麥克寇特新建構主義觀點及其支持、反對與回應的論點

麥克寇特的觀點	支持的論點	反對的論點	麥克寇特的回應
1. 建構主義理論盛況不再、已死。		1. 侯培夫批評麥克寇特的論點並沒有證據證明建構主義理論盛況不再，反而是建構主義擴展成長成為三大理論之一。 2. 史瑞瓦斯塔娃認為麥克寇特的論點像是設定建構主義死亡身後的未來方向，建構主義已死的謠言被誇大了。	排名頂尖的國際關係相關學系2000年聘任建構主義學者數字減緩；實踐理論也不是由在美國工作的學者所推動。
2. 運用「實踐理論」與關係主義組成「新建構主義」，解決建構主義日趨窄化的問題（包括結構論偏見、強調理念勝過實踐及偏好因果關係勝過組成關係）、其內部（知識論及方法論）的碎片差異及有問題的二分法分類。	所羅門支持麥克寇特的觀點，因為他認為建構主義學者必須繼續發展新理論及途徑，保持建構主義在國際關係領域開放及充滿生機的空間。	1. 凱斯勒指出麥克寇特尋求替代管道及概念復活建構主義，但他身為建構主義學者不願轉向實踐理論，因為「實踐理論」與關係主義也不能解決建構主義停滯的二分法問題，兩者要一起建立新建構主義仍有遙遠的距離。 2. 高達德認為建構主義窄化不是特例，社會學理論也是如此，並批評麥克寇特以週期循環的觀點看待建構主義的興衰或內部差異，而應該是對對話的觀點看待；實踐理論與關係主義者樂於自稱建構主義論者，但麥克寇特卻呼籲他們擁抱建構主義的標籤，這會忽略兩者在語意上的政治性。 3. 布格爾指出，不是每位建構主義學者都是「實踐理論」學者，也不應該是，「實踐理論」需要精緻及合適的方法論。 4. 林奇質疑麥克寇特的觀點，只是陷入標籤陷阱，「實踐理論」需要將意圖及倫理納入研究議程，產生有關（實踐）「意義」的具體卓見及概念。 5. 侯培夫以其本人為例，建構主義並未偏好因果關係勝過組成關係。	1. 實踐轉向與關係轉向不是同，但不應誤導認為知識辯論無關學科內外的權力關係。 2. 自由主義的世界觀主宰了國際關係學科，建構主義在美國的國際關係學界是具有重要位置，實踐轉向與關係轉向是值得支持。 3. 關係主義學者高達德、內克森及傑克森等人，稱他們建構主義學者，是因為他們結合了建構主義與關係社會學者觀點，而不是只來自第一代建構主義學者。
3. 以實踐關係主義的場域理論、網絡分析及行為者網絡理論擴展建構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空間。	蒙哥馬利認為麥克寇特的新建構主義觀點統一了場域理論、網絡分析及行為者網絡理論網絡分析，給了學者克服構造論與衰循環的新希望。	侯培夫批評麥克寇特的論點並沒有證據證明，而且因果關係與組成關係的問題是仍有待解決，但場域理論、網絡分析及行為者網絡理論不是解答，而是新增的思考工具，「實踐理論」與關係主義並無法解決（相互）主體互動的問題。	的確無法解決問題，但提供了用的新觀點。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過程關係社會學的過程關係主義探討世界政治變遷中行為主體與結構關係的觀點。<sup>16</sup>秦亞青仍將其觀點翻譯成英文出版於西方學界，藉以與西方國際關係學者對話 (Qin, 2009, 2016, 2018)，進而與西方學者合作探討西方理性與儒學關係性之實踐，即是以關係性界定理性，個體理性是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理論及其邏輯的共同基礎，關係性強調自我與他人共存及一致是個體理性的本體基礎，也就是中庸與和諧，進而結合西方的實踐理論（主要是實踐建構主義學者的觀點）為基礎而發展其國際政治關係理論的實踐 (Qin & Nordin, 2019: 601-608)，乃至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政治關係理論 (Kavalski, 2018a)。秦亞青的國際政治的關係理論實是傑克森 (Jackson, 2006) 「關係建構主義」 (relational constructivism) 的觀點，所不同的是傑克森較以社會理論為論述依據，傑克森聚焦於行為主體與結構之間社會傳動 (transactions) 的進行過程，尤其是行動 (actions) 之前修辭的共同要素 (rhetorical commonplaces) 及資源，以及行為主體的認同及行動所產生的社會行動模式 (Jackson, 2006: 140-144)。秦亞青則較以文化理論為論述依據，聚焦於社會理論的背景知識、實踐社群及文化社群而成為文化理論（即是其關係理論），詮釋多重文化的世界 (the multicultural world) 為各種關係所構成的世界 (a world of relations)，藉以建構其「中國學派」的國際關係理論 (Qin, 2018: 3-74)。

不同於秦亞青以傑克森和內克森的過程關係社會學為依據，石之瑜等人則是從中國儒學、印度佛教、日本京都學派哲學及歷史循環觀點發展其「關係平衡」 (balance of relationships) 理論，即是以相對（或社會）本體論 (relational or social ontology) 假定先於國家存在之前的國際體系「關係性」 (realtionality)，所謂關係性是相互建構的過程，以實踐、自我限制及雙邊為關鍵概念，超越以國際體系「無政府」 (anarchy) 假定所發展的強國政治、歐美「一超多強」霸權式國際關係理論化，建立其「關係平衡」的「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或「新國際關係理論」 (Shih, 2017a, 2017b; Shih et al., 2019)。

簡言之，上述學者間不同的觀點正是顯示出建構主義不同世代學者之間的知識論爭論，這是建構主義理論發展的危機與轉機的關鍵所在，因為對建構主義的未來發展，維繫於樂觀或悲觀看法的學者之間的反思及合作，這也就決定了當前是危機或是轉機。直至今日，建構主義理論未來發展的爭論依然沒有定論也就依然沒有方向，但這正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與發展的常態，學者各自

<sup>16</sup> 在秦亞青 (2009) 的引用文獻中，可以發現 5 次引用。

提出不同的觀點與建議，以獲取志同道合的學者認同與支持，不論是在後設理論、實質理論及經驗研究上，發展出較多學者支持的多元發展方向，而非統一的方向，多元發展的方向或許是殊途同歸，或許是歧途各異，都是為了建構主義理論的發展思考何去何從，也就顯示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豐富性。

## 伍、日正當午：建構主義理論發展的何去何從

無論建構主義內部的世代爭論或對話如何發展，新世代建構主義學者在後設理論、實質理論及經驗研究上，甚至在建構主義理論本身，提出各種不同的思考意見，作為建構主義理論發展的方向。

一、在後設理論研究上，由於建構主義過於涉入後設理論層次研究，不免增加其內外部學者的爭論，誠如托爾斯丹·米奇爾 (Torsten Michel) 所言，後設理論限制了研究的進行 (conduct of inquiry)，應該朝向研究的修辭 (rhetoric of inquiry) 或法律推理，開放後設理論構想的路徑，視後設理論為論證—說服的實踐 (an argumentative-persuasive practice)，以呈現 (presentation) 的形式及規範性的承諾為內容，反思運作此實踐呈現建構主義實質的後設理論內容 (Michel, 2016)。但另有學者認為建構主義與批判國際關係理論的理論綜合是危險的婚外情 (dangerous liaison) (Price & Reus-Smit, 1998)，不好的想法 (a bad idea)，其代價包括誤解、弄錯及扭曲兩者，而且是排他性的，非主流理論是無法加入，更誤導了國際關係各理論皆是典範，誤以為可以也必須將其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及政治承諾視為完整的一體，這阻礙了國際關係理論的豐富性及研究的清晰度，兩者遂必須脫鉤 (Barkin & Sjoberg, 2019: 1-18)。相反地，另有學者主張建構主義遂應該結合國際關係批判實在論學者<sup>17</sup>的後設理論觀點，即是本體論與方法論的多樣性擴展其概念架構及超越物質與理念的區別，以改善建構主義徘徊在反思主義與理性主義之間的內部理論含糊、模糊及不一致性，而能深化其對複雜多層真實 (reality) 的解釋 (Fiaz, 2014: 491-499)。這不是新建議或新方向，在第一、二代建構主義學者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總之，新世代建構主義學者仍然會保持著其後設理論的研究傳承，但其論述方式與內容會更為精緻及易懂，也較能運用於實質理論及經驗的研究。

二、在實質理論與經驗研究上，建構主義錯誤批判了肯尼斯·華爾滋 (Kenneth Waltz) 結構現實主義的結構功能論假定，綜合兩者發展國際政治文化體

<sup>17</sup> 包括寇林·威特、米爾潔·柯基 (Milja Kurki)、約拿丹·約瑟夫 (Jonathan Joseph) 及黑基·裴托馬基 (Heikki Patomaki) 等四位國際關係批判實在論學者 (Fiaz, 2014: 492)。

系結構觀點是有助於建構主義理論的發展 (Goddard & Nexon, 2005)。蘿貝嘉·阿德勒—尼森 (Rebecca Adler-Nissen) 也認為應該重新發現建構主義的符號互動論源頭，並回歸其他符號互動論者的觀點，探討世界政治實務的建構與解構過程 (Adler-Nissen, 2016)。夏洛蒂·艾皮斯坦 (Charlotte Epstein) 則認為藉由國際政治的（社會）結構呈現後結構主義與建構主義的關聯，並嘗試以語言維持建構主義更新的承諾及實踐其理論化國際關係世界的構成性及建構性 (constructedness) 的承諾 (Epstein, 2013)。換言之，建構主義與其他國際關係理論之間並非是「不可共量的」(incommensurable) 典範爭論，是相容互補的。這也不是新的建議，而是新世代建構主義學者重新檢視之前世代學者的觀點，提出更為深入或廣泛的批判論點，提升建構主義理論的理論綜合性，而能與其他的國際關係理論結合運用於國際政治實務。

但建構主義常受到的批評在於其難以進行經驗研究。例如建構主義學者應該先在其本身的知識論基礎上發展競爭的選項，而不是混合或折衷不同的理論或知識論基礎 (Parsons, 2015)。然而，即使建構主義的關鍵概念（認同、論述、規範與理念）難以測量及檢驗，結構與行為主體之見的相互構成關係難以建立模型與因果機制，甚至其視理論預測為深奧的社會學習活動，但其預測在規範與知識論上仍有潛能 (Meyer, 2011)。尤其是在國際規範的部分，由於國際規範處於動態變化的過程難以區別出應然與實然之差異。

遂有裴斯嘗試從實用主義的觀點發展建構主義的國際規範經驗研究 (Price, 2008a, 2008b)。馬丁·威柏 (Martin Weber) 以「後果論者的規範理論」補充裴斯的觀點，但他認為批判理論較建構主義更能呈現規範的實然與應然之間理論化 (Weber, 2014)。凱斯勒以表達可用論述立場數量的「情境概念」(the concept of contingency) 呈現建構主義在理論化規範時的差異，建構主義關注雙重情境中自我 (ego) 與他人 (alter) 之間的相互主體性及互動，而忽視在觀察自我與他人的第三者 (the third)，其他第三者與前二者所構成的社會想像或理性也是重要的 (Kessler, 2016)。<sup>18</sup>無論如何，新世代建構主義學者精進了建構主義理論的經驗性研究，尤其是在非美國地區國家的經驗研究文獻增多，使建構主義依然是主要的國際關係理論之一。

---

<sup>18</sup> 根據凱斯勒的說法，單一 (single) 情境是主體 (subject) 與客體 (object) 之區別、雙重 (double) 情境是自我與他人之間的相互主觀或互動之區別，以及三重 (triple) 情境是觀察自我與他人的第三者之區別 (Kessler, 2016: 43-63)。

三、在建構主義理論本身上，如今建構主義需要邁向不斷的批判，「消除政治化」(depoliticizing) 其隱藏的意識形態及政治現實主義起點，以揭露其面具而具體化或再政治化國際關係理論。例如葛瑞鉤睿歐·貝提薩 (Gregorio Bettiza) 和飛利浦·迪昂尼吉 (Filippo Dionigi) 就以「後世俗世界社會」(post-secular world society) 的伊斯蘭規範擴散為例，說明建構主義背後隱藏的西方中心自由主義、大同主義及世俗偏見 (Bettiza, & Dionigi, 2014: *EUI Working Papers*)。史迪芬·英格爾肯姆 (Stephan Engelkamp) 等人也指出建構主義的國際規範研究是政治性的實踐，因為它重製了西方的價值觀 (Engelkamp, Katharina, & Renner, 2016)。漢斯—馬丁·傑格 (Hans-Martin Jaeger) 也認為當前的建構主義學者應該回應後殖民的挑戰及後西方世界的真實。即是建構主義理論仍是建立在西方國際關係歷史與價值觀的理論，建構主義應該脫離此隱藏的西方中心主義 (Jaeger, 2016)。誠如阿米塔·阿查耶 (Amitav Acharya) 冀望於建構主義能發展出後西方或非西方的理論觀點，扮演「全球國際關係研究」(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的先鋒角色 (Acharya, 2018)。這些不同世代的建構主義學者反思建構主義理論本身的西方理論及價值觀，展現出建構主義學者本身自我反思的能力，也是建構主義理論繼續發展的動力。

四、在「新建構主義」爭論上，麥克寇特結合實踐理論與關係主義的「新建構主義」引起不同世代建構主義學者爭論實踐轉向與關係轉向的議題。國際關係學者認為實踐轉向是成功的，雖尚未完成仍須努力，但前景看好，也正在完成中 (Bueger & Gardinger, 2018: 163-175)。但國際關係學者並未對實踐理論所意涵的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之承諾視為是共同的假定與確信 (Bueger & Gardinger, 2015: 452-453)，「實踐」概念的意義是不一致的、不相容的及混淆的 (Bueger & Gardinger, 2015: 449; Kratochwil, 2011: 36-37)，是異質的及多樣的家族 (Bueger & Gardinger, 2015: 449-450)，甚至無所不包，但這也就沒有意義 (Ringmar, 2014: 6)。遑論實踐轉向學者混淆了「實踐」(practice)、「實用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 及「實務」(practices) 等基本概念，例如實踐是指行為者的所作所為 (all of us doing all of our doings)、實用知識是指行為者所作所為的技能 (the skill at doing what we do)，以及實務是指行為者所做所為的事務 (the things that we do)，三者是不同的概念 (Kustermans, 2016: 175-196)。不免有學者認為實踐轉向被誤解，又得耗費知識能量處理概念混淆，終將會失敗 (Bueger & Gardinger, 2015: 450; Ringmar, 2014)，或是提醒國際關係實踐轉向的學者若是忽視反思，就無法更為全面地說明國際關係變遷了 (Hopf, 2018: 687-688)。

同樣地，國際關係學者對於關係轉向與關係主義的定義、範疇與類型亦是沒有定論，甚至需要超越建構主義研究傳統演進的範圍回歸到「關係的社會理論」(relational social theory) 理解關係主義 (Jackson & Nexon, 2019)。甚至關係主義（關係性）與關係轉向在華語世界與英語世界的國際關係學界，也是具有不同的特質與觀點，但能藉由兩方對話而發展超越歐洲中心的後西方「關係的國際理論或事務」(Kavalski, 2017, 2018b)。換言之，實踐轉向與關係轉向本身仍在爭論之中，結合實踐理論與關係主義的「新建構主義」不免也就引起爭論，但也引起不同世代建構主義學者反思建構主義的未來發展方向。以Google Scholar 檢索麥克寇特「新建構主義」一文就被引用124次，<sup>19</sup>顯見此文的确引起學者關注 (McCourt, 2016a)。

簡言之，建構主義理論需要藉由反思與實踐，使後設理論的爭論落實在實質議題的實踐或經驗研究上，以及自我反思實踐過程中所獲知識的可能限制與潛力。即使目前建構主義學者仍對理論發展危機或轉機、發展方向及何去何從仍無共識，新世代建構主義學者加入建構主義理論的研究與發展，並不意味著其提出的批判及方向是前所未有的創新，而是展現建構主義理論未來發展的前景，雖有十字路口但絕非是走入死巷。

## 陸、結論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正逐漸脫離實證主義的統一科學觀，呈現出本體論、知識論及方法論多元的觀點，其中的差異不免使學者憂慮及悲觀。無論整體國際關係理論或建構主義的理論發展與研究，就是學者在後設理論層次爭論時，提出國際關係理論死亡、終結或建構主義發展緩慢，意圖引發學者更深入探討國際關係理論及建構主義的發展危機與轉機。就建構主義而言，「枯萎與何去何從的問題」(the questions of w[h]ither constructivism) 即代表著國際關係學者思考建構主義理論發展的危機與轉機，提出克服危機挑戰的發展方向。在後設理論爭論所產生的國際關係理論死亡陰影下，甚至是建構主義已死的危機中，學者分別提出建構主義未來的發展方向。顯示著不同世代的建構主義學者「置死地而後生」的理論反思能力，此能力支撐建構主義仍會是國際關係主流理論。

觀諸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歷史，此多元的觀點正是豐富國際關係理論研究

---

<sup>19</sup> 檢索日期為 2020 年 8 月 6 日。

的動力，使不同世代的學者都能選擇各自喜好的理論進行研究，也能引入不同的哲學觀點或其他學科理論發展國際關係理論，所以國際關係理論從未終結，建構主義亦復如此，建構主義理論也未曾死亡，一切都只是學者建構出的「假象」，只是新世代建構主義學者為了引起關注及重視而已。但誠如第一代的建構主義學者克拉奇維爾所指出：

我們無法控制這接下來的賽局，遊戲規則不僅有彈性也經常失效，且是被憤世嫉俗地濫用，或甚至不存在，因為我們為了處理所面對的狀況，卻不知身處何處，甚至也不知問題為何 (Kratochwil, 2016: 123)。

不同世代之間的建構主義學者的爭論與對話，更顯示出新世代學者加入建構主義理論研究所帶來的活力及創新，建構主義理論只是走到十字路口，選擇向哪個方向走去而已，絕非走向死巷，因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本來就沒有死巷，不同的方向與路途各有各的美麗景觀（理論多樣性與豐富性），只是路途長短（為人所知的主流理論或非主流理論）而已。<sup>20</sup>在不同的路途過程中，依然會出現各種不同的交叉路口（例如理論內部的差異觀點爭論），甚至是比十字路口更複雜的交叉路口（內部的後現代極端觀點、傳統頑固觀點爭論），而且也不是只要過了一個交叉路口（內外部的理論觀點爭論）就能抵達目的地（成為主流理論或非主流理論）。主流理論的路途交叉路口少了些、較簡單些，也就走得短些（較為學者所容易接受及接近實務）；非主流理論的路途交叉路口多些、較複雜些，也就走得長些（既得批判主流理論又得提出另類觀點，又較偏離實務）。就建構主義理論而言，不同世代的建構主義學者路途呈現出其從非主流理論走向主流理論的分歧路徑，不免有學者迷失了方向停下了腳步或誤以為走入死巷。但隨著其理論吸引新世代學者加入路途，就會尋找方向繼續走著，只要有學者繼續走著，路途就會有交叉路口但沒有終點。然而，若是任何國際關係理論失去吸引新世代學者，不再有新世代學者加入路途，提出多元多樣的觀點，那就會是死巷了。但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總是延續著古典理論、既

<sup>20</sup> 特別感謝審查人提出：如果接受作者的「十字路口」一說，或許可以進一步追問是否是「單一的十字路口」？或有「複數的十字路口」？是否不同世代已經或未來將面臨不同的十字路口？還有，「本來就沒有死巷」的表述對有些「深」建構主義論者來說可能有些強烈，流露出「本質主義」(essentialism) 的色彩。引發本人深思國際關係理論研究，遂以後文回應審查人的問題。

有理論與吸納其他學科理論而發展，充滿著生命力與活力走向路途。畢竟這一切都不是國際關係學者能夠控制與處理的，只要不斷出現自我反思的學者及理論，就能使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不會終結也不會死亡了。

相較於建構主義理論發展的危機與轉機而言，國內國際關係學者對於建構主義的研究與理解仍是有待後續的努力，否則國內的建構主義理論研究就會終結或死亡了。值得學習中國大陸學者秦亞青的研究及努力，他在引介與參考建構主義理論之後，引導其他學者積極發展出其具有中國特色的關係或過程建構主義，並與西方國際關係學者對話及合作，進而發展出其以文化或關係理論為論述依據，詮釋多重文化的世界為各種關係所構成的世界，藉以建構其「中國學派」的國際關係理論。

新世代建構主義學者在反思批判前世代學者之際，提出理論發展的方向；前世代學者在反思回應新世代學者的批判與建議之時，亦提出理論發展的方向，以殊途同歸的方式共同為理論尋求轉機。建構主義不同世代學者反思其理論發展的危機與轉機，正是其理論生命力與活力之所在，也是支撐其成為國際關係主流理論的動力。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部分

- 秦亞青，2009，〈關係本位與過程建構：將中國理念因素植入國際關係理論〉，《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頁69-86。
- 秦亞青，2015，〈國際政治的關係理論〉，《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2期，頁4-10。
- 秦亞青，2016，〈國際政治關係理論的幾個假定〉，《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10期，頁19-28。
- 徐振國，2013，〈政治學改造運動的爭議和啟發：從「通則」到「脈絡」的轉向〉，《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45期，頁1-61。doi:10.6523/168451532013060045001
- 莫大華，2006，〈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內部的建橋計畫——知識論的對話與綜合〉，《復興崗學報》，第87期，頁221-249。doi:10.29857/FHKAJ.200609.0009
- 莫大華，2009，〈國際關係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差異與方法論多元〉，《問題與研究》，第48卷第3期，頁63-95。doi:10.30390/ISC.200909\_48(3).0003
- 莫大華，2010，〈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心物二元論：Alexander Wendt量子社會科學理論的分析與批判〉，《問題與研究》，第49卷第1期，頁29-58。doi:10.30390/ISC.201003\_49(1).0002
- 莫大華，2011，〈國際關係實用建構主義理論的知識論分析〉，《政治科學論叢》，第49期，頁75-124。doi:10.6166/TJPS.49(75-124)
- 莫大華，2015，〈Nicholas Onuf與Friedrich Kratochwil的社會理論、國際法與國際關係理論連結之比較分析〉，《問題與研究》，第54卷第2期，頁1-31。doi:10.30390/ISC.201506\_54(2).0001
- 鄭端耀，2011，〈搶救權力平衡理論〉，載於包宗和（編），《國際關係理論》，頁69-83，臺北：五南。

### 二、英文部分

- Acharya, A., 2018. "Constructivism and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lse Promise to Vanguard." In M. E. Bertucci, J. Hayes, & P. James, eds., *Constructivism Reconsidered: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p. 263-278).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Adler, E., 2013.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ources, Contributions, and Debates." In W. Carlsnaes, T. Risse, & B.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12-144). London, UK: Sage. doi:10.4135/9781446247587.n5
- Adler, E., & Pouliot, V., 2011a.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3, No. 1, pp. 1-36. doi:10.1017/S175297191000031X
- Adler, E., & Pouliot, V., eds., 2011b.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CBO9780511862373
- Adler, E., & Pouliot, V., 2011c.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 In E. Adler & V. Pouliot, eds.,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pp. 3-35).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dler-Nissen, R., 2016. "The Social Self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dentity, Power and the Rediscovery of Constructivism's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Roots." *Europe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 No. 3, pp. 27-39. doi:10.3224/eris.v3i3.27340
- Barder, A. D., & Levine, D. J., 2012. "'The World Is Too Much with Us': Reification and the Depoliticising of *Via Media* Constructivist IR."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0, No. 3, pp. 585-604. doi:10.1177/0305829812442124
- Barkin, J. S., 2015. "Translatable? On Mixed Methods and Methodolog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3, No. 3, pp. 1003-1006. doi:10.1177/0305829815581534
- Barkin, J. S., & Sjoberg, L., 2019.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st Synthesis?: Decoupling Constructivist and Critical Approach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93/oso/9780190463427.001.0001
- Bettiza, G., & Dionigi, F., 2014. "Beyond Constructivism's Liberal Bias: Islamic Norm Entrepreneurs in a Post-Secular World Society." in *EUI Working Papers*: [https://cadmus.eui.eu/bitstream/handle/1814/31692/MWP\\_WP\\_Bettiza\\_Dionigi\\_2014\\_10.pdf](https://cadmus.eui.eu/bitstream/handle/1814/31692/MWP_WP_Bettiza_Dionigi_2014_10.pdf), Available: 2020/10/15.
- Bleiker, R., 2015. "Pluralist Methods for Visual Global Politic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3, No. 3, pp. 872-890. doi:10.1177/0305829815583084
- Bohman, J., 2009. "What Is to Be Done?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3, pp. 488-498. doi:10.1017/S1752971909990170
- Booth, K., ed. 2011. *Re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 Brown, C., 2013. "The Poverty of Grand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Relations*, Vol. 19, No. 3, pp. 483-497. doi:10.1177/1354066113494321
- Bueger, C., 2017. "Let's Count Beyond Three: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Terrain of International Practice Theories." in *Symposium: Seizing Constructivist Ground? Practice and Relational Theories*. v. 2.0: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7HQWDJ&version=2.0>, Available: 2020/10/15.
- Bueger, C., & Gadinger, F., 2014. *International Practice Theory: New Perspectives*.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doi:10.1057/9781137395535
- Bueger, C., & Gadinger, F., 2015. "The Play of International Practi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9, No. 3, pp. 449-460.
- Bueger, C., & Gadinger, F., 2018. *International Practice Theory: New Perspectives* (2nd ed.).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Buzan, B., & Little, R., 2001. "Wh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Failed as an Intellectual Project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1, pp. 19-39. doi:10.1177/03058298010300010401
- Checkel, J. T., 2017. "Constructivism at Mid-Life: Theory, Methods and the Turn to Mechanism."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52, No. 3, pp. 411-413.
- Chernoff, F., 2009. "Defending Found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3, pp. 466-477. doi:10.1017/S1752971909990133
- Chernoff, F., 2013. "Science, Progress and Pluralism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1, No. 2, pp. 346-366. doi:10.1177/0305829812464405
- Christiansen, T., Jørgensen, K. E., & Wiener, A., eds., 2001. *The Social Constructions of Europe*. New York: Sage. doi:10.4135/9781446221105
- Crawford, R. M. A., & Jarvis, D. S. L., eds., 2000.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Toward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Thought*.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Emirbayer, M., 1997. "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3, No. 2, pp. 281-317. doi:10.1086/231209
- Emirbayer, M., & Goodwin, J., 1996., "Symbols, Positions, Objects: Toward a New Theory of Revolutions and Collective Actio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5, No. 3, pp. 358-374. doi:10.2307/2505454
- Engelkamp, S., Katharina, G., & Renner, J., 2016. "Normalising Knowledge? Con-

- constructivist Norm Research as Political Practice.” *Europe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 No. 3, pp. 52-62. doi:10.3224/eris.v3i3.27342
- Epstein, C., 2013. “Constructivism or the Eternal Return of Universa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y Returning to Language Is Vital to Prolonging the Owl’s Fligh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pp. 499-519. doi:10.1177/1354066113494669
- Ferguson, Y. H., 2015. “Diversity in IR Theory: Pluralism as an Opportunity for Understanding Glob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16, No. 1, pp. 3-12. doi:10.1111/insp.12092
- Fiaz, N., 2014. “Constructivism Meets Critical Realism: Explaining Pakistan’s State Practice in the Aftermath of 9/11.”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0, No. 2, pp. 491-515. doi:10.1177/1354066112466572
- Goddard, S., 2017. “Hiding in Plain Sight? The Not-So-Secret Constructivism of Relationalism.” in *Symposium: Seizing Constructivist Ground? Practice and Relational Theories*. v. 2.0: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7HQWDJ&version=2.0>, Available: 2020/10/15.
- Goddard, S. E., & Nexon, D. H., 2005. “Paradigm Lost? Reassessing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1, No. 1, pp. 9-61. doi:10.1177/1354066105050136
- Gould, H. D., ed., 2017. *The Art of World-Making: Nicholas Greenwood Onuf and His Critics*. London, UK: Routledge. doi:10.4324/9781315268934
- Guzzini, S., 1998.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Continuing Story of a Death Foretold*. London, UK: Routledge. doi:10.4324/9781315004884
- Guzzini, S., 2000. “A Re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2, pp. 147-182. doi:10.1177/1354066100006002001
- Guzzini, S., 2013. “The En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tages of Reflexivity and Modes of Theorizing.”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pp. 521-541. doi:10.1177/1354066113494327
- Guzzini, S., & Leander, A., eds., 2006.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doi:10.4324/9780203401880
- Hoffmann, S., 1977.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

- lus*, Vol. 106, No. 3, pp. 41-60.
- Hollis, M., & Smith, S., 1991. "Beware of Gurus: Structure and Ac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4, pp. 393-410. doi:10.1017/S0260210500112082
- Hopf, T., 2017. "There Are No Panaceas in Social Theory." in *Symposium: Seizing Constructivist Ground? Practice and Relational Theories*. v. 2.0: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7HQWDJ&version=2.0>, Available: 2020/10/15.
- Hopf, T., 2018.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4, No. 3, pp. 687-711. doi:10.1177/1354066117718041
- Ish-Shalom, P., 2020. "The Third Generation Constructivism: Between Tactics and Strategy." In B. J. Steele, H. D. Gould, & O. Kessler, eds., *Tactical Constructivism, Method,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1-23). New York: Routledge. doi:10.4324/9781315109039-2
- Jackson, P. T., 2006. "Relational Constructivism: A War of Words." In J. Sterling-Folker, ed., *Making Sens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139-155).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 Jackson, P. T., 2009. "A Faulty Solution to a False(ly characterized) Problem: A Comment on Monteiro and Ruby."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3, pp. 455-465. doi:10.1017/S1752971909990145
- Jackson, P. T., 2011. *The Conduct of Inqui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doi:10.4324/9780203843321
- Jackson, P. T., 2015. "Must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 a Science?"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3, No. 3, pp. 942-965. doi:10.1177/0305829815579307
- Jackson, P. T., & Nexon, D. H., 1999. "Relations Before States: Substance, 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5, No. 3, pp. 291-332. doi:10.1177/1354066199005003002
- Jackson, P. T., & Nexon, D. H., 2013.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aradigmatic Era: From Substantive Wagers to Scientific Ontologi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pp. 543-565. doi:10.1177/1354066113495482
- Jackson, P. T., & Nexon, D. H., 2019. "Reclaiming the Social: Relationalism in Anglo-phone International Studie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2,

- No. 5, pp. 582-600. doi:10.1080/09557571.2019.1567460
- Jaeger, H.-M., 2016. "Revisiting Constructional Defects of Constructivism in IR." *Europe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 No. 3, pp. 14-26. doi:10.3224/eris.v3i3.27339
- Kasza, G., 2001. "Perestroika: For an Ecumenical Science of Politics."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34, No. 3, pp. 597-599. doi:10.1017/S1049096501000944
- Katzenstein, P. J., Keohane, R. O., & Krasner, S. D., 1998.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pp. 645-685. doi:10.1017/S002081830003558X
- Kavalski, E., 2017. *The Guanxi of Relational International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doi:10.4324/9781315109657
- Kavalski, E., 2018a. "Guanxi or What Is the Chinese for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8, No. 3, pp. 397-420. doi:10.1093/irap/lcy008
- Kavalski, E., 2018b. "The Guanxi of Relational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 No. 3, pp. 233-251. doi:10.1007/s41111-018-0096-0
- Keohane, R. O., 2015. "Perestroika and Global Politic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3, No. 2, pp. 418-422. doi:10.1017/S1537592715000109
- Kessler, O., 2016. "The Contingency of Constructivism: On Norms, the Social, and the Third."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5, No. 1, pp. 43-63. doi:10.1177/0305829816655879
- Kessler, O., 2017. "Two Wrong Don't Make A Right: On Constructivism, Practice and the Linguistic Turn." in *Symposium: Seizing Constructivist Ground? Practice and Relational Theories. v. 2.0*: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7HQWDJ&version=2.0>, Available: 2020/10/15.
- Kessler, O., & Steele, B., 2016. "Introduction: 'Constructing IR: The Third Generation.'" *Europe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 No. 3, pp. 7-13. doi:10.3224/eris.v3i3.27338
- Klotz, A., 2001. "Can We Speak a Common Constructivist Language?" In K. M. Fierke & K. E. Jø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Next Generation* (pp. 223-235). Armonk, NY: M. E. Sharpe. doi:10.4324/9781315705446
- Klotz, A., 2018. "The Power of Prejudice: The Race Gap in Constructivist Interna-

- 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In M. E. Bertucci, J. Hayes, & P. James, eds., *Constructivism Reconsidered: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p. 87-102).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Kratochwil, F., 2011. “Making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In E. Adler & V. Pouliot, eds.,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pp. 36-6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CBO9780511862373.004
- Kratochwil, F., 2016. “A Funny Thing Happened on the Way to the Forum: Ruminations Concerning the Disappearance of Constructivism and Its Survival in the Farcical Mode.” *Europe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 No. 3, pp. 118-136. doi:10.3224/eris.v3i3.27348
- Kristensen, P. M., 2015. “Revisiting the ‘American Social Science’—Mapping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16, No. 3, pp. 246-269. doi:10.1111/insp.12061
-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urki, M., 2009. “The Politics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3, pp. 440-454. doi:10.1017/S1752971909990157
- Kurki, M., & Wight, C., 2016.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ocial Science.” In T. Dune, M. Kurki, & S.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4th ed., pp. 13-3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93/hepl/9780198707561.003.0002
- Kustermans, J., 2016. “Parsing the Practice Turn: Practice, Practical Knowledge, Practice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4, No. 2, pp. 175-196. doi:10.1177/0305829815613045
- Lacatus, C., Schade, D., & Yao, Y. (J.), 2015. “Quo vadis IR: Method, Methodology and Innovation.”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3, No. 3, pp. 767-778. doi:10.1177/0305829815587822
- Lake, D. A., 2013. “Theory Is Dead, Long Live Theory: The End of the Great Debates and the Rise of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pp. 567-587. doi:10.1177/1354066113494330
- Leira, H., & de Carvalho, B., 2016. “Construction Time Again: History in Constructivist IR Scholarship.” *Europe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 No. 3, pp. 99-111. doi:10.3224/eris.v3i3.27346

- Lynch, C., 2017. "Why 'Practice Theory' Should 'Get Religion.'" in *Symposium: Seizing Constructivist Ground? Practice and Relational Theories*. v. 2.0: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7HQWDJ&version=2.0>, Available: 2020/10/15.
- McCourt, D. M., 2016a. "Constructivism's Contemporary Crisis and the Challenge of Reflexivity." *Europe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 No. 3, pp. 40-51. doi:10.3224/eris.v3i3.27341
- McCourt, D. M., 2016b. "Practice Theory and Relationalism as the New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0, No. 3, pp. 475-485. doi:10.1093/isq/sqw036
- McCourt, D. M., 2017. "Constructivism's Past and (Possible) Future: A Response to Responses." in *Symposium: Seizing Constructivist Ground? Practice and Relational Theories*. v. 2.0: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7HQWDJ&version=2.0>, Available: 2020/10/15.
- McCourt, D. M., 2018. "The Future of Constructivism: A Constructivist Assessment." In M. E. Bertucci, J. Hayes, & P. James, eds., *Constructivism Reconsidered: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p. 33-46).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McCourt, D. M., & Steele, B. J., 2017. "World of Our Making and Second-Generation Constructivism." In H. D. Gould, ed., *The Art of World-Making: Nicholas Greenwood Onuf and His Critics* (pp. 1-13). London, UK: Routledge. doi:10.4324/9781315268934
- Mearsheimer, J. J., & Walt, S. M., 2013. "Leaving Theory Behind: Why Simplistic Hypothesis Testing Is Bad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pp. 427-457. doi:10.1177/1354066113494320
- Mercado, R., 2009. "Keep Muddling Through?"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3, pp. 478-487. doi:10.1017/S1752971909990169
- Meyer, C. O., 2011. "The Purpose and Pitfalls of Constructivist Forecasting: Insights from Strategic Culture Research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Evolution as Military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 3, pp. 669-690. doi:10.1111/j.1468-2478.2011.00648.x
- Michel, T., 2016. "Third Generation Constructivism and the Rhetoric of Inqui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 No. 3, pp. 87-98. doi:10.3224/eris.v3i3.27345

- Mills, C. W.,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nroe, K. R., 2005. *Perestroika!: The Raucous Rebell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onteiro, N. P., & Ruby, K. G., 2009a. "IR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1, pp. 15-48. doi:10.1017/S1752971909000050
- Monteiro, N. P., & Ruby, K. G., 2009b. "The Promise of Foundational Prudence: A Response to Our Critic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3, pp. 499-512. doi:10.1017/S1752971909990236
- Montgomery, A., 2017. "A New Hope? Practice Theory, Relationalism, and the Paradigm Wars." in *Symposium: Seizing Constructivist Ground? Practice and Relational Theories*. v. 2.0: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7HQWDJ&version=2.0>, Available: 2020/10/15.
- Neumann, I. B., 2014.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Social Science."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3, No. 1, pp. 330-350. doi:10.1177/0305829814539860
- Neumann, I. B., 2015. "International Studies Must Be a Social Science: A Friendly Quarrel with PTJ."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3, No. 3, pp. 966-969. doi:10.1177/0305829815576947
- Onuf, N. G., 1998. "Constructivism: A User's Manual." In V. Kubalkova,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pp. 58-78). New York: Routledge. doi:10.4324/9781315703299
- Onuf, N. G., 2002. "Worlds of Our Making: The Strange Career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D. J. Puchala, ed.,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sessing an Academic Field* (pp. 119-141).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Onuf, N. G., 2013. *Making Sense, Making Worlds: Constructivism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doi:10.4324/9780203096710
- Onuf, N. G., 2016a. "Constructivism at the Crossroads; or, the Problem of Moderate-Sized Dry Goo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 10, No. 2, pp. 115-132. doi:10.1093/ips/olw001
- Onuf, N. G., 2016b. "The Road from La Flèche." *Europe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 No. 3, pp. 112-117. doi:10.3224/eris.v3i3.27347
- Onuf, N. G., 2017a. "Social Struggle: Response to David M. McCourt and Brent J.

- Steele.” In H. D. Gould, ed., *The Art of World-Making: Nicholas Greenwood Onuf and His Critics* (pp. 14-16). London, UK: Routledge. doi:10.4324/9781315268934
- Onuf, N. G., 2017b. “The Bigger Story.”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50, No. 1, pp. 93-96. doi:10.1017/S1049096516002225
- Onuf, N. G., 2018. “Preface: The Dinosaur Speak!” In M. E. Bertucci, J. Hayes, & P. James, eds., *Constructivism Reconsidered: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p. xiii-xix).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Parsons, C., 2015. “Before Eclecticism: Competing Alternatives in Constructivist Research.”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7, No. 3, pp. 501-538. doi:10.1017/S1752971915000135
- Peltonen, H., 2016. “Constructivism, Cognition, and Duality.” *Europe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 No. 3, pp. 76-86. doi:10.3224/eris.v3i3.27344
- Perestroika. 2005. “The Idea: *The Opening of Debate*.” In K. R. Monroe, ed., *Perestroika! The Raucous Rebell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pp. 9-11).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rice, R. 2008a. “Moral Limit and Possibility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2, No. 2, pp. 191-220. doi:10.1017/S2200818308080132
- Price, R., ed., 2008b. *Moral Limit and Possibility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CBO9780511755897
- Price, R., & Reus-Smit, C., 1998. “Dangerous Liaisons? Critical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Constructivis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 No. 3, pp. 259-294. doi:10.1177/1354066198004003001
- Qin, Y., 2009. “Relationality and Processual Construction: Bringing Chinese Ideas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Vol. 30, No. 4, pp. 5-20. doi:10.1080/02529200903342560
- Qin, Y., 2016.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8, No. 1, pp. 33-47. doi:10.1093/isr/viv031
- Qin, Y., 2018.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9781316869505
- Qin, Y., & Nordin, A. H. M., 2019. “Relationality and Rationality in Confucian and Western Traditions of Thought.”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2, No. 5, pp. 601-614. doi:10.1080/09557571.2019.1641470
- Raymond, M., 2019. *Social Practices of Rule-Making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93/oso/9780190913113.001.0001
- Reus-Smit, C., 2001. "The Strange Death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2, No. 3, pp. 573-593. doi:10.1093/ejil/12.3.573
- Ringmar, E., 2014. "The Search for Dialogue as a Hindrance to Understanding: Practice as Inter-Paradigmatic Research Program."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6, No. 1, pp. 1-27. doi:10.1017/S1752971913000316
- Schouten, P., 2015. "THEORY TALK #70: Nicholas Onuf on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Turns in IR, and A Discipline of Our Making." *Theory Talk*. <http://www.theory-talks.org/2015/07/theory-talk-70.html>, Available: 2020/10/24.
- Shih, C.-Y., 2017a. "The Relational Turn East and West From Chinese Confucianism to Balance of Relationships." *Kor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1, No. 6, pp. 107-127. doi:10.18854/kpsr.2017.51.6.005
- Shih, C.-Y., 2017b. "Transcending Hegemon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zation: Nothingness, Re-Worlding, and Balance of Relationships." *All Azimuth: A Journal of Foreign Policy and Peace*, Vol. 6, No. 2, pp. 19-42. doi:10.20991/allazimuth.310126
- Shih, C.-Y. et al., 2019.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Balance of Relationships*. New York: Routledge.
- Sil, R., & Katzenstein, P., 2010. *Beyond Paradigms: Analytical Eclectic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Sjoberg, L. & Barkin, J. S., 2018. "If It Is Everything, It Is Nothing: An Argument for Specificity in Constructivisms." In M. E. Bertucci, J. Hayes, & P. James, eds., *Constructivism Reconsidered: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p. 227-242).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Skinner, Q. 1985. "Introduction: 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Q. Skinner, ed., *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Human Science* (pp. 3-2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S. 2000.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 No. 3, pp. 374-402. doi:10.1111/1467-856X.00042
- Smith, S. 2002.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gemonic Country, Hegemonic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2, pp. 67-85. doi:10.1111/1521-9488.00255

- Solomon, T. 2017. "Unpacking Constructivism Through Affect, Space, and Time." in *Symposium: Seizing Constructivist Ground? Practice and Relational Theories*. v. 2.0: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7HQWDJ&version=2.0>, Available: 2020/10/15.
- Srivastava, S., 2017. "W(H)ither Constructivism." in *Symposium: Seizing Constructivist Ground? Practice and Relational Theories*. v. 2.0: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7HQWDJ&version=2.0>, Available: 2020/10/15.
- Stangebye, H., 2016. "Ohio State Professor Challenges Classical View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Lantern*: <http://thelantern.com/2016/01/ohio-state-professor-challenges-classical-view-of-consciousness>, Available: 2020/2/20.
- Steele, B. J., 2012. "Never Trust Anyone Who Remembers Jerry Rubin: The Promise of Generational Conflict." In B. J. Steele & J. M. Acuff, ed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Gen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s* (pp. 25-46).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doi:10.1057/9781137011565\_2
- Steele, B. J., 2017. "The Politics of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US Academy."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50, No. 1, pp. 71-74. doi:10.1017/S1049096516002171
- Steele, B. J., & Acuff, J. M., 2012. "Introduction: The Evolution of Generational Analysis and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B. J. Steele & J. M. Acuff, ed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Gen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s* (pp. 3-24).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doi:10.1057/9781137011565\_1
- Steele, B. J., Gould, H. D., & Kessler, O., eds., 2020. *Tactical Constructivism, Method,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doi:10.4324/9781315109039
- Tan, S. S., 2006. "Rescuing Constructivism from the Constructivists: A Critical Reading of Constructivist Interventions in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9, No. 2, pp. 239-260. doi:10.1080/09512740500473288
- Van Krieken, R., 2001. "Norbert Elias and Process Sociology." In G. Ritzer & B. Smart,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Theory* (pp. 353-367). London, UK: Sage. doi:10.4135/9781848608351.n27
- Walter, T., 2019. "The Road (not) Taken? How the Indexicality of Practice Could Make or Break the 'New Constructivis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5, No. 2, pp. 538-561. doi:10.1177/1354066118779664

- Weber, M., 2014. "Between 'Isses' and 'Oughts': IR Constructivism,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Challeng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0, No. 2, pp. 516-543. doi:10.1177/1354066112466573
- Weber, M., 2020. "The Normative Grammar of Relational Analysis: Recognition Theory's Contribution to Understanding Short-Comings in IR's Relational Tur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4, No. 3, 641-648. doi:10.1093/isq/sqaa036
- Wendt, A., 1992.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pp. 391-425. doi:10.1017/S0020818300027764
- Wendt, A.,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CBO9780511612183
- Wendt, A., 2006. "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 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 In S. Guzzini & 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pp. 181-219). New York: Routledge. doi:10.4324/9780203401880
- Wendt, A., 2015. *Quantum Mind and Social Science: Unifying Physical and Social Ont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CBO9781316005163
- Wight, C., 2002.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 Carlsnaes, T. Risse, & B.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3-51). London, UK: Sage. doi:10.4135/9781848608290.n2
- Williams, M. C., 2013. "In the Begin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lightenment and the En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pp. 647-665. doi:10.1177/1354066113495477